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青 春 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262 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

### 目 录

#### 【论 文】

从中原到边疆：对典范中国史的反思

王明珂

俄罗斯并未“重塑苏联记忆”

——俄新编中学历史教材仍否定苏联体制和苏共领导人

左凤荣

论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形成、发展与终结

张玉艳 杨 恕

德国少数民族：两种认同的互动平衡

黄柯劼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论 文】

# 从中原到边疆：对典范中国史的反思<sup>1</sup>

王明珂<sup>2</sup>

我们被自身的记忆支配（we are what we remember），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老生常谈之语，但它仍能深刻地说明“历史”的现实意义。如蚕织茧，让自己生活其间，我们也创作及相信“历史”，让自己沉浸在“历史”所建构的世界里。对周遭发生的事，我们或感到哀怒，或奋臂疾呼力争，或抛头颅、洒热血；无论如何，历史记忆为我们塑造一个世界，并为我们在其间安排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与位置。我们成为中华民族中的汉族或少数民族，台湾人或美国华裔族群，成为科技业精英或深圳打工族，这些都发生在社会记忆建构的世界中，让我们成为记忆的玩偶，言行举止皆让此世界更“真实”。

这并非是说，我们所处的世界与社会现实不美好，而是，我们缺乏认识这世界及其社会现实的能力。我们所知及所关心的“历史”，便是社会记忆的一种形式内涵。学者们争论历史事实，解构历史事实，建立新的史观（以某种立场选择性建构及诠释历史），都经常受到自身的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身份认同与社会现实的影响。这些身份认同来自于社会中流行的典范历史；陷于如此循环中，我们如何可能深入认识这世界？

以近代普世性的民族与国家认同来说，各个国家都通过各种方式（国民历史教育只是其中之一）建构及传播典范历史知识，以历史记忆（国族历史）打造爱国、爱民族，并愿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与尊严而行动的个人。然而，这样的“历史”及以此打造的国民或民族成员，经常与由另一些“历史”塑造的他国或他族之人产生敌对与冲突；东亚地区中、韩、日三国间的“历史”战争，便是其中的显例。在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中，如中国，典范历史记忆更造成国民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和两难困境。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诸多的国际政治纷扰，包括前述中、日、韩三国间因历史产生的敌意，使得解构民族主义成为历史学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风尚。被解构的主要对象便是“历史”：后现代史学告诉人们，“你所相信的历史是近代民族主义下的想象与建构”，以此解构人们的国族认同。然而如此学术风潮，常流为学者各据其国家与文化认同立场而相互解构。因此问题仍在于，学者自身之认同受其历史记忆影响，以至于轻率地解构“他者”之国家与民族认同，更无法提供理想的政治社会蓝图。

那么，我们是否可能建立一种历史知识体系，不必否定或破坏人们的国家与民族认同，但让人们从刻板的身份认同中解放出来，让人们能真切地认识世界的过去，及其如何走向现在，因此对当今社会有所体认、反思及回应，以此让这个世界朝较为良善、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自我调整？以下，我们以当代中国人认同与相关历史记忆为例，来探讨此问题。

## 国民、民族与中国民族国家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受世界性民族主义潮流影响，以及在帝国主义列强侵袭而有亡国灭种危机之局势下，中国经历将传统中原帝国与其边裔人群结合为一个民族国家之过程，其中包括以军事与政治手段建立统一的国家体制，及以学术和教育建立并推广与之对应的知识体

<sup>1</sup> 本文刊载于《文化纵横》2015 年第 4 期，第 32-41 页。

<sup>2</sup>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研究员。

系。关于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时发生在中国边疆的变化提出一些近于感慨的议论：

在 20 世纪上半叶，“国民”（citizen）与“民族”概念同时进入中国，也随着边疆地理与民族考察而进入中国边疆——造“国民”与建构“民族”同时进行。无论如何，相对于造国民，建构民族简单得多；经由学术研究与政治安排，一个个民族群体被认定、识别而加入国族之中……。看来，近代中国之国族国家建构有一未竟之功，那便是造“国民”（或公民）。

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是普世性的现象。无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人群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此多为想象与建构），或是由多民族构成，当代民族国家的特质与要素之一，便是“同质性的国民”；这样的个人，也是构成当代国家的基本元素。所谓“同质的国民”是指，国民虽有贫富阶级之不同，有智愚及贤与不肖之别，术业各有其专攻，但他们应有些共同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社会常识。地理说明国族同胞共享的资源领域，历史说明此国族、国家及其领域如何由过去走来，政治社会常识则说明民族国家之现况及其内部区分。当代国家之国民普及教育及边民教育等，皆在于打造同质性的国民。

我们可以从许多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边疆的人与事上，观察当时同质性国民之建构过程。如我在过去著作中提及的，一位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调查者黎光明，对于川康之边的“西番”喇嘛不知道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南京，感到十分讶异且有趣。另一位民族考察者刘锡蕃，在广西省三江任县长时曾以我国第一、二届总统是谁、什么叫做三民主义等问题，让 30 个“苗獠”男子作答；他称，结果令人失望之极。事实上这反映的便是，同质性的国民概念当时已深入这些抱持民族国家观念之民族考察者心中，他们因而对国族边缘同胞之无知感到讶异与失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近代以前。所以，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对国族边缘之“西番”及“苗獠”之无知于国事及国家史地感到讶异、失望，这事本身倒是奇特而值得我们深究。

事实上，当年的边疆考察者不只是讶于边民对民族国家的无知，也讶于居于民族国家核心的一般知识分子对边疆之地与人的无知。1930 年代，感于国人地理知识中甘肃西南部、青海南部、西康北部“还是一片白地”，让青年探险家与民俗考察者庄学本，“为了这样大的使命”，进入边区进行考察。同样在 1930 年代，感慨于“我侪今日苟未身至川西，固已不知版图之内尚有羌人……斯真学林之憾事也”；这样的感慨也让语言学者闻宥深入岷江上游完成其“羌语”调查，让国人从语言上认识这川西民族。

这是一种对国族核心与边缘两相无知的焦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这样的焦虑与使命感，以及因此产生的知识探索行动，其成果是：以体质、语言、民族、历史与考古等学术，建立关于边疆之地理、历史、民族、风俗、语言、宗教等知识体系，并将它们纳入中国民族史与中国民族志之大知识框架中。这样的知识体系，透过著作、演说、影视及国民教育等媒介，以及透过受此知识锻造之“人”的身体表演（如民族传统服饰与歌舞展演），逐渐成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的共同国民常识。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知识所造成的个人，究竟是“国民”还是“民族”？或者，这类知识造成的“国民”是否如 19 世纪末梁启超理想中的国民：“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称“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看来在他心目中，在建立民族国家这回事上“民族”与“国民”同样重要。然而，经过许多历史变化后，今日中国由 56 个民族构成，梁氏所言有同一言语风俗之民族国家已不可得，但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仍可能凝为国族（nation），并如梁氏所称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因以发达”。问题仍是，后来逐渐成形的典范中国民族与历史知识，是否能造成如此国族？以及构成此国族的单元“民族”与“国民”两者孰轻孰重？

让我们回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局势。在当时民国草创之乱局中，打造国民有些必要步骤，包括以军事手段扫除障碍，建立全民参政制度，建立均衡区域性经济落差的国家财政体制，以及

之后更重要的，以民主法治教育启迪民智，让每个国民都知其社会权利、义务，且能以行动展现或争取其国民地位。当时国民政府面对内外交煎之政治社会局面，在边疆连扫毒枭、军阀以维持社会治安秩序都力有未逮，更遑论以教育启迪民智了。为了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执政者走的是一条快捷道路：那便是，在民族概念下，透过历史、语言、民族等多学科之调查、研究，建立一个个的民族范畴，而将边疆人群经识别而纳入各少数民族内，以此整合在民族国家之中。这样的多民族之民族国家建构，以及相关的民族分类、识别工作，在鼓吹民族自治的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更被积极推动，而终造成今日汉族与 55 个少数民族之中国国族现况。

## 民族史与现代中国人认同

支持这样一个多民族之民族国家建构的知识，最重要的便是民族史。典范中国民族史之架构萌于清末。到了 1940-50 年代，多部名为《中国民族史》或《中华民族史》的著作先后问世。民国肇造后三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此时被化约为一些简单的考古学、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知识，蕴含于仰韶-龙山文化、汉藏语系、蒙古人种、母系社会等学术词汇中，被纳于中国民族史论述之内。这样的历史，一方面继承中国 24 史以来的王朝历史记忆与革命建国记忆，另一方面以新学科知识来强调国族之一体性（如汉藏语系、蒙古人种），区分国族文明发展上的古老核心（仰韶-龙山文化）与落后边缘（母系社会、游牧社会），以及胜利者（炎黄民族集团）与失败者（蚩尤、三苗等民族集团）。它们后来经史学家择良汰羸，最终形成今日我们所知的典范中国民族史—典范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样的历史知识，说明由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构成之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分——除了各民族间的语言、文化等区分外，还有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文明先进者与落后者，以及施予者和被施予者等区分，皆为“历史”所肯定。在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这样的中国史也施于台湾的国民教育中，以塑造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便是我自从小从历史教科书乃至于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中读到的，上自三皇五帝、尧舜文武，下启汉唐盛世，以及华夏英雄北驱鞑虏、南平苗蛮的历史。

1949 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此王朝典范历史架构上添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史观。特别是，受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影响，中原王朝历史被套入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时代阶段之中。而在这样的史观下，边疆人群更成为人类社会演化之后进者；如“历史”常称，当中原进入封建及资本主义阶段时，许多中国边疆人群“仍停留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在中国本部的共产革命成功后，他们才因而从封建农奴主手中得到解放。另一历史诠释上的重大改变是，王朝历史记载上的流寇乱民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我年轻时亦多少受此影响，而在第一本著作《楚乡千古为悲歌：项羽传》中称陈胜、吴广等发起的是“农民革命”。当时我受到台湾警备总部的纠正，被迫承认“农民只是盲目地被野心者利用”而幸免于牢狱。

中国人认同中的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也曾被检讨、修正。在历史见解上的表现便是，1980-90 年代，考古学大家苏秉琦先生的中国史前文明发展“满天星斗”之说，以及社会学、人类学巨擘费孝通先生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

苏氏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类型，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文明之兴呈现“满天星斗”的多元型态，以此反驳文明起源的中原核心论。他还指出中国历史学界有两个“怪圈”，一是根深柢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忽略中原之外其它地区之历史文化，另一则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及全部，忽略了历史的多元面貌。他对当时流行之历史观的批评，针对的便是前面提及的清末以来传承自 24 史，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国民族史观，以及共产革命以来的唯物进化论史观。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注意到中原汉族之外中国边疆多民族的存在，及

其与汉族往来互动中的彼此交融，但他强调的仍是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扮演的核心与凝聚者角色。较为新颖的是，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也就是说，虽然近代以前没有任何人主观地自称为中华民族之人，但客观上，经由历史上的战争、贸易及人口迁移等密集互动，多元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实体早已存在。

无论如何，多年来这种典范中国民族史、社会进化史，包括费孝通、苏秉琦等学者的修正版本，受到多方面现实的挑战。一是，在来自国际学界的后现代史学及解构民族主义风潮下，这种典范历史内容的偏颇、谬误、忽略，以及其近代建构过程与背后的知识霸权被学者一一揭露、批判，因而其真实性在国内也受到质疑（至少在部份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二是，居于中国人认同边缘的台湾人、藏族、蒙古族、维族之部份知识分子，或引用前述国际学者对典范中国民族史的解构，或更普遍地对此“历史”批驳、忽略及遗忘，同时建构本土观点的历史记忆（另一种知识霸权下的典范历史），以支持及鼓吹去中国化的民族认同；三是，当“历史”造成中国 56 个民族之政治现实，它便僵化成一种肤浅但却无可动摇的国民常识：“中国民族史”成为一种乏人问津的鸡肋学问，也因此中国历史学者常无力反驳国外学者对典范中国民族史的解构。这三种对典范中国民族史的挑战，多少都威胁着与此“历史”相倚的中国与中国人蓝图，一个形成于 1911 年革命后的新人类生态体系。

## 人类生态观点下的典范中国史反思

我将出现于 20 世纪由多民族构成之新中国与中华民族视为一人类生态体系，是为了以此角度检视“现在”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以及探讨目前流行于中国的历史论述是否支持这样的人类生态体系，也以此提出我对相关历史的看法。

人类生态，我指的是，人类所居环境、经济生业与社会结群，三层面环环相扣之综合体。环境指人类所居之自然环境，与人们对它的修饰、改造与领域边界建构。经济生业是指人们利用环境以获得生存资源的种种生计手段（如农、牧、贸易等等）。社会结群则是，人们为了在特定环境中经营其经济生业，以及为了保护、分配、竞争领域和生存资源，而在群体中建构的种种社会组织（如家庭、部落、国家），以及相关的人群认同与区分（如性别、年龄、贵贱、圣俗群体，以及由家庭到民族的广义“族群”等等）。以上三层面构成人类生态之本相。我们还可以加上第四层面，文化与其表征。在此，我以“文化”泛指人们为巩固其社会组织，以及为维持种种社会人群认同与区分，所建构的语言、文字、习俗、宗教、仪礼、道德、法律、品味、美学、服饰、建筑等等社会规范。“文化表征”则指人们依循文化而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建构，如端午节庆活动、祭山神活动、婚礼，服饰穿着，日常生活之惯性行为，以及人们所宣称的“历史”等等。我将文化与其表征——“历史”——视为人类生态之表相；它们强化本相，掩饰本相，但也能反映本相（若我们能解读这些文化表征）。

以此，我们看看近代形成的新中国；一个将传统中原帝国之四裔族群与汉人结为一国族，建立民族国家，如此造成的资源开发利用、分配、分享、竞争之人类生态体系。在其中，以人群来说，传统“华夏”与“华夏边缘”结为一体；以领域来说，过去中原帝国与其四裔邦国部落之域结为一体。相对于过去“华夏”与“华夏边缘”分离、对立，中原帝国对其四裔施行征伐、防范或严苛统治羁縻，以维持华夏及中原帝国统治阶层对资源的垄断，以及不断有北方游牧人群争夺生存资源的“单于南下牧马”、南方因不堪帝国税赋而生“苗乱”的人类生态，可以说，这是较为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

我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即曾表示这样的观点，并以欧亚大陆东、西两部之人类生态为例说明。欧亚大陆的西半部为，沿大西洋岸多有经济富足而讲求人权、自由的国家，内陆各国则

多因资源匮乏及受垄断，而常卷入以宗教、种族、阶级、性别冲突为表相的资源争夺之中。欧亚大陆的东半部则为，在理想上，由太平洋沿岸到内陆亚洲的内蒙、新疆、西藏共同组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新中国，以经济援助、互补来解决内亚地区的资源匮乏或不均衡问题，并以国家力量来维持各地域人群（或民族）间的秩序。我认为，由人类生态角度来看，欧亚大陆东半部在其特殊的历史经验下，近代所进行的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人类生态改造计划，而在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历史经验造成的是极不均衡的（或被割裂分离的）人类生态体系；近一年来西亚的伊斯兰国（ISIS）的快速发展及其造成的动荡，只是此人类生态的表相之一。

理想终究不是现实。我们得承认，目前 56 个民族构成的中国人类生态体系远非完美。以边疆少数民族之情况来说，穷出不层的西藏、新疆问题，以及因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而造成南方边地农村经济空洞化的问题，即为明证。让我们回到“历史”与这一人类生态体系的关系上。如果说这是因为“历史”被解构、遗忘、争论而动摇此人类生态体系，不如说是此“历史”本身便有许多问题，因而使得被这样的“历史”（历史记忆）塑造的中国人，无法让这个人类生态体系得到良性的运作与调整。甚至让许多人不接受这个“历史”及其造成的现实，建立外于“中国人”的群体认同及相关“历史”，并试图将本群体从中国人类生态体系中分离出来。对外，也因“历史”，让这个人类生态体系与邻邦（亦为各人类生态体系）有些矛盾与对立。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典范中国民族史造成许多人的汉族中心主义及中原核心主义，使得他们无法理性对待少数民族及日、韩、越、印等邻国之人。

虽然人们常提及汉族中心主义（或大汉族主义）、中国中心主义（或大中国主义），并对此反思检讨。但事实上，它们在中国根深柢固的程度远比人们所知要深远，要去此中心主义也远比人们所得知困难；原因在于，它们根植于人们的历史记忆，并被“自然化”在一般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活言行之中，人们也因此接受自己因“历史”造成的宿命（居于国族核心或边缘的较优或较低劣地位）。人们到长城观光，演奏歌颂黄河母亲的乐曲，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品尝炸虫蒸蛇之“传统原生态”饮食，欣赏央视新年节目中的少数民族歌舞。这些文化表征所强化的现实本相，对理想中多元一体之新中国人类生态体系绝对是有损无益的。

即使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早期文明“满天星斗”之说，强调的都是中国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由多元文明及多元文化构成的一体。如此古今同质的中国民族史看法，忽略了由过去中原王朝到今日中国的人类生态进步，也难藉以认识及弥补当前中国人类生态体系的缺失。这种“自古以来中国便是多民族构成之国家”的中国民族史概念，也表现在称辽、金、元等中原王朝为“少数民族政权”，称成吉思汗为曾征服大半个欧洲的“中国人”等错置时空的历史论述上。

我们可以注意一些简单而明显的社会现象，如过去中原帝国对付游牧部族的战争防御构筑“长城”，以及岷江、大渡河上游各部族彼此防备的战争防御构筑“碉楼”，今日都成了观光景点。这些“物”的表征意义在不同人类生态体系中的变化，难道不足以让我们检讨“昨日之非”？过去“蛮夷”受人歧视，如今部分边地之人争相成为少数民族，如此“人”的情感与行为表征之时代变化，难道不足以让我们珍惜“今日之是”，并检讨缺失以期有更理想的未来？又何必坚持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

## 反思性历史知识与反思性认同

我以“华夏边缘”概念为主轴的一系列著作，对于中国典范历史与民族知识中的古代华夏、中原帝国与汉人认同多有解构与尖锐批判。我的用意在于：透过“华夏边缘”的古今变化，揭示过去的“蛮夷”成为今日中国少数民族的过程，并将此变迁置于人类生态中来理解及反思其意义，以期能构造更好的人类生态体系。我的学术志业与期望便是，建立一种反思性的历史与人类

学知识，以此知识塑造具有反思性认同的个人。

我所称的反思性研究，最好的比喻可以从英文 reflex 这个字来理解。Reflex 是指，我们踩到尖锐的石头而产生抽回脚的反射性动作。反思性研究的要旨（与前提）在于，生活在种种知识所建构的世界里，我们对于周遭世界的感触十分麻木，受到刺激也浑然不觉；没有感觉、认知，自然也没有反应。或我们被各种“偏见”左右，难以看清社会现实本相。“历史”便是让我们对社会现实感觉麻痹的脚底老茧。反思性研究希望透过一些方法，让我们认识事物的本相；如去除脚底的茧皮，让脚真切地感触地面因而有所反应。以下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反思性历史知识。

我们从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主题谈起。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固然基于坚实的考古学证据及研究，但我们不能忽略，在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约在距今 4000-3500 年之间，中原之外的古文明大多纷纷陨落，而中原却由二里头、二里岗至于夏商，沿续性地朝阶序化、集中化的复杂社会发展；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过程。此说并非是中原核心主义复辟。相反的，基于人类生态，我们对“文明”应有些反思：文明是社会阶序化、职业分工化及政治权力集中化之社会产物，它依靠燃烧被迫害者的膏脂而发出光芒。文明演进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过得更好，而“失败”也不表示人们从此落入悲惨世界。承认中国早期文明发展有“月明星稀”之过程，我们也不必讳言今日中国“56 个民族多元一体”中有一个独大的“元”，也就是人口、资源远胜于其它各民族的汉族。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从历史源头来探讨核心成为核心、边缘成为边缘，以及后来核心与边缘结为一体的过程。

我们再看看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于商、周王朝，以及秦汉帝国及其长城出现的人类生态变化及其意义。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我提及，距今约 4000 年至 3000 年前的气候干冷化，对华北新石器时代晚期边缘环境的农业聚落人群造成很大的冲击。河湟、内蒙南部、陕北、西辽河地区绝大多数农业聚落都凋敝、消失。经过一个人类活动遗迹少或不明的时段后，在这些地区出现经济生活上相当依赖羊、马、牛等草食动物，定居程度低，并有武装倾向的人群。此一波长期气候干冷化，也对农业条件较好的黄河流域人群造成影响；商、周王朝统治体系之形成，可说是以政治集中化来保护及开发资源、以阶序化社会进行资源分配，来因应此资源环境变化造成的人类生态。

西周至于战国时期，此一人类生态体系有重大变化；在前述北方依赖草食动物的人群南移争夺农牧资源的情况下，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概念（华夏心目中的戎狄蛮夷等异族概念）同时形成。秦、汉帝国是此一新人类生态体系的具体化身及维护机构。汉帝国不断向各方扩张其资源领域。西北方，帝国势力由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南北，由陇西进入青海河湟。正北方，中原帝国将其北方资源界线——长城——推到农业资源的北方极限，甚至将祁连山、阴山草原纳入其中。东北方，秦汉帝国军政势力及其移民进入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为了因应中原帝国带来的生存压力，中原周边人群或调整其生计方式，或改变其社会政治组织，以获得新的生存资源，以与中原帝国及其它人群争夺生存资源。于是，北方蒙古草原各游牧部落组成匈奴国家，以军事行动对汉帝国施压以获得生存资源。西北方的西羌，以部落及暂时性的部落联盟来抵抗汉帝国入侵。东北方乌桓、鲜卑则以部落联盟，高句丽以国家组织，与汉帝国争夺资源领域。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代长城的人类生态意义，以及经历 2000 多年的战争与和平后今日长城成为国际观光景点的人类生态意义。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长城历史？如典范中国史强调长城的伟大，歌颂保卫长城的英雄人物，斥责历史上北族“寇边”造成的破坏与骚乱？或者是，说明长城及中原帝国在广大地区造成的资源分配失衡（包括在帝国内部），北方各游牧、半游牧部族因此努力以各种策略突破长城，而终让它失去资源垄断意义的历史？说明为追求较安全的生活长城内的富室奴仆穿越长城投入匈奴，长城外的穷困匈奴部族穿越长城移入塞内，这些“穿越”让长城失去经济阻隔功能的历史？或是蒙古王公突破传统生计，招汉民移垦塞北可耕之地，此“突破”让长城失去其分隔农牧功能的历史？或说明为追求丰厚商业利益，长城内的商人进入草

原，让长城南北之民皆逐渐困于商业资本主义及高利贷，以致于也让长城失去意义的历史？我认为，只有尊重及呈现所有这些突破与穿越之历史，才能理解古今长城意涵的变化，才能体认许多北方民族成为今日中国人的人类生态意义。简单地讲，今日中国需要的是长城在众人努力下逐渐解体而成为观光景点的历史。

我们再以中国新疆的历史为例。依据典范的中国史，今日羌族、藏族、彝族，以及其余十多个西南少数民族，皆为古羌人的后裔，而古羌人在历史上又大多融于汉族。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讲中所言，羌人以供应为主，壮大其他民族，便是此意。这样的历史，强调这些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与汉族以及中国的一体性与不可分割性。

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羌”为华夏心目中的西方非我族类，因此在华夏历史记忆中“羌”所指涉的地与人群概念，随着华夏认同的向西扩展，有一自东向西漂移的历史过程，当被称为“羌”的西方人群自称华夏或汉人之后，他们称更西方的人群为“羌”。因此，并没有所谓的“古羌人后裔”；汉、藏之间的密切关系并非在民族血缘，而是在“边缘”。

汉、藏有一共同的族群边缘；汉历史文化记忆中的“氐羌”，与藏历史文化概念中的“朵康”，都指的是青藏高原东缘的地与人。汉、藏都视这个区域部落人群为我族的一部份，但都鄙视这个边缘人群。这在历史记忆上的表征便是，汉晋时华夏便认为西方羌人是三苗后裔；三苗是华夏大家庭中的坏份子，被舜帝打败而放逐至西方。在藏族前身吐蕃人之族群认同形成时（约在公元9-12世纪），吐蕃知识精英也创造一个“历史”，称吐蕃人起源于远古的六兄弟，其中两个坏弟弟被逐于东边与大国（指中原帝国）交界处，成为那儿部落人群的祖先；这些边境部落指的便是青藏高原东缘的朵、康各部落。所以说，在汉、藏历史记忆中，青藏高原东缘诸部落、村落人群都是本民族家庭成员，但又是家中的坏份子。这个例子也说明，反思性历史知识不以“历史事实”来坚持及争论“当前现实”，而是从一些历史记忆中——透过文本与表征分析——尝试体认过去及反思现在。

我们再以流行于岷江上游羌、藏社会中的“弟兄祖先历史”为例，说明此种反思性历史知识，以及它能让我们对典范中国史有什么样的反思。“弟兄祖先历史”是一种模式化历史记忆，其叙事模式为，从前有几个弟兄来到本地，在此分别建立几个寨子；人们以此“过去”来解释“现在”几个村寨人群的来源。它们所“陈述的”并非历史事实，但其“流露的”却是几个人群对等合作、区分与彼此对抗的人类生态。这样的“历史”曾普遍流传于藏区（如前述吐蕃源于六弟兄之说）及西南地区。如此人类生态，可以让人们（汉与藏）共同反思一个历史现象：那便是当“边缘”变成“边界”，如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原帝国置岷江、大渡河以西于不顾时，青藏高原上便以部落分立“无相长一、更相抄暴”为常态。相反的，当与中原帝国有“热切往来”时，如吐蕃进犯唐帝国，或乾隆发动大小金川之役，都能让藏区、康区各部落团结起来。

更重要的，“弟兄祖先历史”让我们对自身所相信的“历史”有反思性认识；我们，世界上所有阶序化、集中化社会之人，所相信的常是一种“英雄祖先历史”。这是一种反思性研究策略：在化奇特为熟悉之后，将我们视为熟悉的事物视为奇特，而加以分析、反思。典范中国史便是一部“英雄祖先历史”，除了炎帝、黄帝及“北伐胡虏”的华夏英雄祖先历史记忆外，华夏常认为邻近他族也是华夏英雄祖先的后代，但这些英雄多半是失败的、受挫折的或被污化的英雄。徐福东渡日本成为开化日本人的英雄祖先，箕子奔于朝鲜而成为教化朝鲜人的祖先，以及，高辛帝家里的一只狗盘瓠，娶了公主后奔于南方而成为蛮夷之祖。在这些历史（有些被我们视为神话）记忆下，自然让一个中国人难以平等看待南方少数民族以及日、韩等邻国之人。

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这本书中，我重新理解中国史籍中的箕子、太伯、庄蹻、无弋爰剑、盘瓠等“英雄历史”，将它们视为中原华夏对四方他者之族群性的期望与想象。譬如，箕子开化朝鲜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华夏想象及期望朝鲜之人成为我族的情感与意图。历史上朝鲜半岛



对于箕子历史的接受、排拒与诠释，以及中国南疆之人对盘瓠“历史”的接受与再书写，也反映人们处于庞大中原政治势力旁的本土认同情感及其历史变迁。在这样的历史知识中，我强调的不是由一些文献中淬取“史实”，而是将这些文献记载视为一种社会记忆，如同一位羌族叙述本地“弟兄祖先历史”，我从中尝试体认叙述、书写者的情感、意图及其所处社会的认同情境。

我们再以被中西学者争论不休的“汉化”为例。在流行的中国历史观念中，外夷“汉化”有如百川归海那么得必然与自然；“历史”也告诉人们，传统中国文化对外族十分开放与接纳，只要他们接受中国文化，“夷狄入于华夏则华夏之”。学者可以举出历史上许多胡人去胡服、胡语，西南蛮夷过中秋、端午等节日的铁证。但我认为，这些历史所呈现的最多只是宏观历史过程下的汉化结果，以及表相化的文化现象；它所忽略的是微观的汉化过程，以及文化表征、表相背后的人类生态本相，以及在其间个人的认同情感与意图。我曾注意明清至民国时期，川西北石泉县（北川）一些山间人群的“汉化”过程。特别是在1950年代以前的近代，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中，人们皆自称“汉人”，夸耀自家的汉年节习俗地道，并辱骂上游村落人群为“蛮子”；上游村落的人因不堪受辱，也自称本家族为“汉人”，模仿、践行汉文化习俗，并喊更上游村落人群为“蛮子”；此便是本地人所称，过去“一截骂一截”的情况。这种亲近人群间的相互夸耀与歧视，也表现在许多历史文献记载之中，只是它们很容易被大历史忽略。我以生物学名词“拟态”（*mimesis*）来形容这样的汉化过程与人的意图：便如一只蝴蝶将自己伪装成一片树叶，一只毛虫伪装成蛇，人们也为了保护自己或为追求较安全的身份而汉化。

我相信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如中、韩学者对箕子及高句丽历史之反思性认识，可以减少许多因争“历史事实”造成的两国人民间的敌意与潜在冲突。对盘瓠历史（或神话）的反思性认识，以及相关的，对于过去普遍在南方发生之“汉化”现象的反思性认识，可为苗族与汉族造成全新的反思性民族或国民身份认同。基于人类生态的反思性历史知识，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当代现实的人类生态背景。如匈奴以武力迫使汉帝国释出长城内的资源，靠近长城的游牧部族便离不开长城，最终造成南北匈奴的分裂；这样的历史知识，可以让蒙古族人及汉族人共同思考，今日内蒙为中国的一部份而外蒙为一独立共和国的人类生态背景，及其在历史上的延续与变迁。

一个人可能成为具反思性的苗族、蒙古族或汉族，或成为不坚持任何民族身份的反思性中国人。创造具反思性认同的中国人，也便是造“国民”（或公民）。一个个具反思性之现代国民，应是理想中多“元”一体中国的构成单元。在这样的中国人认同下，一个人（无论是否仍自称汉族、藏族、羌族）对自身所处的“现在”，以及此“现在”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均有基于人类生态的反思性了解。因此，不必反驳“国族近代建构论”，也无需坚持“中国自古便是一多民族国家”，反思性历史知识自能创造对现在具有深度认知，并因此对未来有期许、规划并能付诸行动的个人。如同一个人揭去脚底的硬皮老茧，而对脚底所触的世界开始有深切感受，因此有所行动、作为。这些作为即使十分微小，也终会对周遭世界造成一些改变。

## 【论 文】

# 俄罗斯并未“重塑苏联记忆”<sup>1</sup>

——俄新编中学历史教材仍否定苏联体制和苏共领导人

左凤荣<sup>2</sup>

【提要】普京把历史教育作为凝聚国民共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工具，要求编写统一的中学历史教材。新版历史教材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的评价基本反映了俄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总体上否定了激进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一党执政的专制体制。教材把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统称为“1917年俄国大革命”，称这一革命改变了俄国和世界的历史，指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导致了国内战争，酿成了俄国历史的悲剧。教材承认，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工业化等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谴责了集体农庄制度和大镇压。教材强调，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联人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胜利，强调卫国战争对世界的贡献，淡化了斯大林的作用，并指出了斯大林的一些失误。教材肯定了赫鲁晓夫时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但对他搞个人集权、没有触动斯大林体制，持批判态度。教材基本否定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认为苏共追求稳定导致了体制的严重危机，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苏联体制危机发展的结果，认为改革的失误和8·19事件，加速了苏联解体。

【关键词】俄罗斯；苏联体制；历史教科书；斯大林

普京重视对俄罗斯青年的爱国主义和历史自豪感教育，认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这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特别重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从2012年开始，普京要求编写统一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俄罗斯历史协会组织专家首先制定了《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新教法总构想框架》，作为新编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这一工作是在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他也是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并成立了专门的编写小组。编写小组的副组长是教育部长利瓦诺夫与文化部长兼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津斯基，组长是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此外，近百位历史学家、教师，以及社会组织和俄罗斯地区（总计有50个地区）参与了这项工作，并两次大规模征求意见。2013年10月30日，俄罗斯历史协会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定稿。2014年1月16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新教法总构想框架》的作者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历史教科书是依据新教法的总构想框架编写的，20世纪苏联历史的部分是重头，共有四章：大震荡年代的俄国、1920-1930年代的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战后至苏联解体。

2016年，新编历史教材正式出版。之所以赶在2017年十月革命100周年前出版，是为了配合对1917年俄国大革命的纪念。经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批准的教材共有三种，其中两种涉及苏联时期（另外一种关于苏联时期的论述未获教育和科学部批准，正在修改）：一种是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托尔库诺夫担任主席、6位专家（包括院士、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季什科夫，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与世界经济所科学委员会两位主席之一的阿尔辛基耶夫，将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第1741中学校长潘金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乌科洛娃）组成编委会，具体由加利诺夫、达尼洛夫等8位作者撰写的《俄国

<sup>1</sup> 本文主要内容刊载于《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1期。

<sup>2</sup>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史·十年级》，该教材由莫斯科教育社出版，共有三册<sup>1</sup>；第二种是由通讯院士、历史学家奥·沃洛布耶夫等三人编写的《俄国史：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由莫斯科大鹄出版社出版<sup>2</sup>，只有一册，供中学10年级学生使用。这两本教科书都是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写到2014年。第一本教材的特点是叙事详细，特别是有不少谈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内容；第二本教材对史实的叙述则比较简略，没有面面俱到，但观点更鲜明，评论更多。这两本教材的共同点是，都对许多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观点与资料，并提出问题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教材反映了俄罗斯学界的主流观点和国家历史观，由于其作者均是在俄罗斯很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这些观点因而更具权威性。2016年12月1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2017年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00周年。这是回顾俄罗斯革命原因和本质的又一个重要契机。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和学术界，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应当客观、诚实、深入地探究这些事件。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应该予以尊重。”“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首先是为了和解，为了巩固社会、政治以及公民和谐。我们今天实现了这种和谐。”“不管我们的祖辈曾经站在哪个阵营，让我们牢记一点：**我们是统一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只有一个俄罗斯。”这些教材基本贯彻了普京的这一思想，向学生传达的信息是：俄国历史有起伏变化，政权多次更迭，但俄罗斯人的英雄主义和爱国情怀不曾改变。为了更好地确定俄罗斯未来前进的方向，俄罗斯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苏联时期的胜利与悲剧，看待这一时期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社会再次发生革命和动荡。教材歌颂了人民的英雄主义和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突出了苏联对世界的贡献。教材很重视研究社会和人民情绪的变化。限于篇幅，本文并不想全面地评价这些教材，而只想考察一下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即这些教材如何看待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苏共的领袖们，如何看待诸如十月革命、工业化、集体化、苏共二十大、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以及如何看待苏共所建立的体制模式。

我国一些人没有认真研读这些俄罗斯新编历史教材，就认定这些教材是对以往被戈尔巴乔夫改革所颠覆的苏联时期历史的“重塑”，“正面描述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历史史实。”<sup>3</sup>这些教材确实没有全面否定苏联时期，俄罗斯政界和学界也从来没有全面否定过苏联时期，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曾充分肯定苏联工业化的成就和卫国战争的贡献。这些教材基本肯定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对苏联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如给予二月革命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谴责斯大林的大恐怖和集体农庄制度，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稳定实际是停滞等等。

## 一、把十月革命放在“大震荡时期”来考察

在苏联时期，十月革命被视为现代史的开端，被认为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的大事。现在，俄罗斯的教材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现代史的开端，把十月革命纳入“‘大震荡’时期的俄罗斯”来考察。这一时期从1914年开始到俄罗斯内战结束。1917年发生了俄国大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同属于俄国大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造成的影响巨大，是十月革命爆发的重要历史背景。“战争期间总动员了1500万人，到1916年底，在前线和后方活跃着650万人，平均每个月被打死、打伤、俘

<sup>1</sup> Горинев М.М., Данилов А.А., Морозов М.Ю. и др. / Под ред.Торкунова А.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0 класс. В 3-х частях. Москва.: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16г.加利诺夫等：《俄国史·十年级》（以下简称教育社版教材）。

<sup>2</sup> Волобуев О. В., Карпачев С. П., Романов П. 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о XX - начало XXI века. 10 класс. Москва.: Дрофа, 2016г. 沃洛布耶夫等：《俄国史：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以下简称大鹄版教材）。

<sup>3</sup> 李琳：《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重塑“苏联记忆”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4期，第68页。

虏的部队人数为 17.5 万。被俘者甚至多于受伤和牺牲的人，达到了 340 万人。”<sup>1</sup>战争开始时，人们满怀爱国热情，认为很快就会取得胜利。1915 年以后，社会氛围发生变化，反战情绪不断增长。不仅士兵和农民，甚至许多军官也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周围的人不满。1917 年初，纪念流血的星期日周年时，爆发了 15 万工人参加的游行，游行者打出了“要面包！”“打倒战争！”等口号。2 月 22 日，尼古拉二世动身去最高指挥部，23 日首都开始出现骚动，27 日，人们抗议面包短缺的集会演变成了起义，近半数士兵参加了起义。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多党联合政府。这一政府最初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主，后来经过了 4 次改组，到十月革命时，临时政府总理是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政府成员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临时政府没有能够解决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列宁号召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武装起义者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和冬宫。“1917 年 2 月，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出现了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权，但在其后几个月里，这个政权并没有解决国家的重要问题——土地与和平问题。持续的战争与经济崩溃强化了激进革命者——布尔什维克的力量。1917 年 10 月，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政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夺取了政权。在俄国，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了政权的最高机关，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则成为政府（人民委员会）的首脑。1918 年初，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宣告成立。”<sup>2</sup>“1920-1930 年代，苏俄的发展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经济的军事化、国家调节作用的增强与专政体制政权的建立。”<sup>3</sup>

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教材没有直接给出结论。早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曾称十月革命是十月政变。新编教材没有表明态度，而是分别提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布尔什维克称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权，因为它为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提供了可能。但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反驳说，苏维埃并没有向全体人民开放，政权实际上只是由一个政党所控制。布尔什维克解释说，1917 年的十月革命在深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但其反对者批驳说，十月革命相对于二月革命是反革命，二月革命开辟了俄国建立民主国家发展的道路。”<sup>4</sup>教材向学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学生思考：“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政变’等，你认为哪种看法更正确？为什么？”<sup>5</sup>

关于列宁是否为了在俄国开展革命而接受了德国人的帮助的问题，教材没有回避。“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积极参加二月事件，党的许多领导人当时或囚于监狱或侨居海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党员不超过 2.4 万人，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只有几百人。”“1917 年 4 月 3 日，以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乌里扬诺夫）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乘坐专门的铅封车厢，从瑞典经过德国领土回国。”<sup>6</sup>大鸨版教材在正文中没有谈及此事，但给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列宁是怎么从侨居地回国的？为什么他的回国旅程迄今仍能引起许多争论？<sup>7</sup>两本教材都强调，正是列宁的回国，使社会主义者改变了同临时政府的合作政策，也改变了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各政党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态势。

十月革命是社会大动荡的产物，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新生活在深重的痛苦中诞生。经济破坏导致饥饿和贫困。苏维埃政权试图保障工人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开办了公共食

---

<sup>1</sup> 大鸨版教材，第 13 页。

<sup>2</sup> 大鸨版教材，第 86 页。

<sup>3</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 1 册，第 5 页。

<sup>4</sup> 大鸨版教材，第 62 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 47 页。

<sup>6</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 1 册，第 31 页。

<sup>7</sup> 大鸨版教材，第 40 页。

堂和消费合作社。工人阶级家庭搬到了‘资产阶级的住宅’（公共住宅就是这样产生的）。但这并不能使急剧下降的生活水平停止下降。……无家可归的儿童最为贫困，据不同的统计，国内战争结束时，有500万至700万儿童失去了父母和亲人，沦为孤儿。”<sup>1</sup>

教材承认1917年革命（包括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1917年俄国大革命不仅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狭义上的革命范畴，包括从1917年2月到10月的革命——从推翻君主到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广义上则指从沙皇制度崩溃到布尔什维克在原俄罗斯帝国的疆界内确立权力为止的整个历史阶段。”“俄罗斯革命爆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性的事件，最大的政治经济悲剧之一）背景下，不断增长的革命运动导致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成为过去。”“但是只有俄罗斯诞生了崭新的国家——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长期社会政治危机的结果。”<sup>2</sup>“1917年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件之一，对我国而言，这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传统发生根本性断裂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建。”“十月革命的意义超出了本国的范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成为世界千百万人的榜样。到处都出现了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布尔什维克感觉自己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不同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被联合了起来。他们面临的一项任务是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思想不仅影响着革命者，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社会的不公平发展，少数富人将奢华的生活建立在千百万人贫困和受压迫的基础上，将导致社会的崩溃。他们开始调整自身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并严禁共产主义者扩大影响。”<sup>3</sup>“由于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苏维埃试验’被认为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sup>4</sup>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承认，并非价值判断。

## 二、对列宁的活动肯定不多，谴责列宁的政策引起了国内战争

教材承认，“列宁是俄共（布）的建立者和无可争议的领袖，甚至他的对手也承认他是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尽管他在党内并没有占据任何特殊的职位（他只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但其领袖的威信是绝对不可动摇的。”<sup>5</sup>不过，教材对列宁的活动正面评价不多，认为布尔什维克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苏维埃政权。国家的政策完全由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中央委员会来决定，后来由其更小的机关——政治局来决定。”<sup>6</sup>“1917年革命引发了国内战争，这是俄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篇章之一。”<sup>7</sup>“国内战争这一民族悲剧是俄国社会深刻分裂的结果。”<sup>8</sup>战争和革命分裂了社会，所幸的是，布尔什维克找到了恢复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跃进。

1918至1921年初的国内战争造成了沉重的灾难。这两本教材都大量描述了国内战争对国家和民族的伤害，实际上都不认同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体制，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解散立宪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实行粮食专政）是造成国内战争的主要原因。

教材把国内战争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宣布解散经全民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开始在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俄国

---

<sup>1</sup> 大鸨版教材，第80-81页。

<sup>2</sup> 大鸨版教材，第86页。

<sup>3</sup> 大鸨版教材，第79页。

<sup>4</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5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92页。

<sup>6</sup> 大鸨版教材，第51页。

<sup>7</sup> 大鸨版教材，第61页。

<sup>8</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5页。

爆发国内战争的主要原因。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流血多，对抗双方都极其残酷。战争带来的是经济破坏，饥荒和疾病的肆虐。数百万人被打死，许多人被迫离开祖国。”<sup>1</sup>选举立宪会议代表和召开立宪会议是当时俄国社会的重要诉求，布尔什维克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因此，在夺取政权后的1917年11月上旬便举行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选举的结果是：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得票率为46.3%，社会革命党人的为29.9%，立宪民主党为12.8%，孟什维克的为3%；在农村，布尔什维克的得票率为18.6%，社会革命党的为44%，立宪民主党的为2.2%，孟什维克的为2.5%；在士兵中，布尔什维克的得票率为42.1%，社会革命党的为37.2%，立宪民主党的为2.3%，孟什维克的为3.4%；在全国范围内，布尔什维克的得票率为22.5%，社会革命党的为39.5%，立宪民主党的为4.5%，孟什维克的为3.2%，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得票率为14.5%，以非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得票率为9.6%。从选举结果看，布尔什维克只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在士兵中的得票较多。在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180席，社会革命党获得388席，左派社会革命党获得40席，立宪民主党获得15席，孟什维克获得27席，其他党派获得113席。<sup>2</sup>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当选立宪会议主席。立宪会议由于没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行事，而遭到解散。中苏学术界都强调，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为保住新生政权而不得已的行为。但俄罗斯新版教科书却没有肯定这一点，“不列斯特和约不仅使俄国丧失了部分土地和人口，其沉重的和平条件也激化了俄国的国内局势，许多人把布尔什维克看成是国家利益的背叛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激烈批评布列斯特和约，并离开了人民委员会。”<sup>3</sup>布列斯特和约导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的分裂。

中国与苏联学术界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看成是内战的结果，认为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争取战争胜利。教材却把这一政策看作内战爆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布尔什维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搞粮食专政，“粮食专政是由不依靠农民的苏维埃实施的，因为多数苏维埃控制在社会革命党手中。1918年6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了贫农委员会，以帮助中农和富农手里没收粮食。斯维尔德洛夫是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号召农村分裂成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并在其中燃起内战。”<sup>4</sup>“苏维埃政权给了农民土地却剥夺了农民的劳动成果，引起了农民的不满。红军战胜弗兰格尔后，国内战争并没有结束，红军的敌人不是白军，而是绿军（农民），“绿色反对红色”。许多地方反对粮食专政，其中36个州出现了反抗红军的军事行动。规模最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出现在顿河流域、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

“忽视民主形式，解散立宪会议，走上消灭自己反对者的道路和建立一党专政，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走上武装斗争之路。布列斯特和约与1918年春夏在农村的激进政策燃起了国内战争的战火，参加武装反抗布尔什维克的还有持爱国情绪的城市居民和相当一部分农民。”<sup>5</sup>战争起初是局部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革命党。1918年底到1920年底，内战进入了新阶段，交战双方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白军。在此期间，一战已经结束，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俄国的干涉。1921年到1922年内战的最后阶段，主要是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内战最激烈的对抗出现在红军和白卫军之间。教材并没有过高评价反抗布尔什维克的一方，而是认为，建立军事专政，白色恐怖并不比红色恐怖好，白卫将军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以及吸引民众的纲领。

内战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得到巩固。教材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取胜的原因：“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政权性质定为‘工农政权’，为民众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解决土地与

---

<sup>1</sup> 大鸨版教材，第87页。

<sup>2</sup> 大鸨版教材，第55-56页。

<sup>3</sup> 大鸨版教材，第59页。

<sup>4</sup> 大鸨版教材，第65页。

<sup>5</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58页。

和平问题受到欢迎；为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进行斗争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不公正的和平、粮食专政、恐怖）；列宁及其支持者提出的深入人心的口号使其在政治斗争中轻松地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宣传机器，用革命思想和口号吸引民众；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白军的将军们没能解释他们因何作战。”<sup>1</sup>布尔什维克成功地争取了富有经验的旧军官的支持，建立了政权体系，控制了经济中心地带，反抗布尔什维克的阵营却没有能够团结起来。“国内战争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群众的立场。在残酷的抉择面前，他们试图避免进行选择，在经过艰难的摇摆后最终选择支持布尔什维克。”<sup>2</sup>

关于内战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教材持谴责态度。“内战期间，整体损失了1200万至1300万人，其中约一半为饥饿和疾病所致，大批俄罗斯人移居海外，近200万人离开了自己的祖国。”<sup>3</sup>经济处于灾难之中，“此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分裂了，苏俄是最大的新国家。在这个国家存在的是苏维埃体制，理论家认为这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实际上建立的是一党专政，除了俄共（布）外，其他政党在苏俄都被禁止存在。”<sup>4</sup>“布尔什维克得以保住对自己政敌的胜利。红军打败了‘民主的反革命’和白色运动，镇压了反对军事共产主义（首先是粮食专政和粮食征收制）的农民起义，最终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sup>5</sup>

国内战争结束后，建立统一国家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成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激烈争论的问题。斯大林建议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国家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其内部的自治共和国，但列宁认为自治化方案不合时宜，坚持采取平等共和国的联合的方式。列宁的主张最终胜出。”“**苏联宣布建立在权力平等和享有主权的各共和国自愿联合的基础上，每个共和国拥有自己的法律、权力机关、司法体系，以及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sup>6</sup>普京曾公开批评这一政策，认为这是在国家大厦下面埋了一颗炸弹。教材承认，“布尔什维克把前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统一为一个国家，开始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苏联阶段。**一方面激发了民族的自我意识，建立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苏联确立的原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常导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共同地域的各民族权利受到钳制。**”<sup>7</sup>

教材对列宁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给予了较多肯定。教材认为，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很大程度上是形势所迫。“根据不同统计，1921-1922年间，饥饿和疾病带走了100-500万人的生命。”<sup>8</sup>苏俄向世界寻求帮助。“在20年代与实行新经济政策相联系的阶段，面临失去政权的威胁，布尔什维克作出‘暂时的让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为小型私有企业的建立与使用外国资本，提供了可能。经济领域的最高指挥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一党制也被保留下来。新经济政策医治了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的创伤，克服了饥荒，恢复了经济。”<sup>9</sup>由于“新经济政策给了‘资产阶级’自由，许多俄共（布）党员、红军战士和工人对新秩序提出了批评。列宁坚信这只是暂时的退却，苏维埃政权还可以转向‘经济恐怖’，同时，他也没有急于埋葬新经济政策，经常说实行这一政策是‘严肃和长期的’。”<sup>10</sup>教科书承认新经济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国家经过几年便达到了战前的经济发展水平，1926年的工业生产达到了1913年的水平，而且在某些领域，如机器制造、采煤和石油，以及交通运输工具方面，超过了战前水平。苏

<sup>1</sup> 大鸨版教材，第76页。

<sup>2</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86页。

<sup>3</sup> 大鸨版教材，第76页。

<sup>4</sup> 大鸨版教材，第76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87页。

<sup>6</sup> 大鸨版教材，第93页。

<sup>7</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107页。

<sup>8</sup> 大鸨版教材，第90页。

<sup>9</sup> 大鸨版教材，第149页。

<sup>10</sup> 大鸨版教材，第91页。

联开始生产涡轮机、拖拉机和石油工业设备。耕种面积和畜牧业得到恢复，1926年的农民丰收打破了纪录——7680万吨谷物。”<sup>1</sup>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国家的、集体的和私人的，国家的主要问题得到解决——经济恢复了，但是在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与人均商品产量方面，苏联还落后于其他工业化强国。

### 三、否定斯大林体制，认为其建立的工业强国有弱点

教材肯定了苏联时期的社会进步，“这一时期，苏联在世界上率先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苏联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解决了流浪儿和文盲问题，实现了妇女权利平等，建立了医疗体制，确立了妇幼保健体系等等。1930年代，苏联实施了全民免费教育，在城市是7年。”<sup>2</sup>教材否定了斯大林的许多政策，及其建立的体制模式，也谴责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和大镇压。

斯大林当了总书记后，掌握了任免干部的权力，将自己的支持者安插到相应的岗位，使自己在党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斯大林是抛弃新经济政策和转向‘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倡议者，这一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是从消灭个体农民经济，以集体农庄取而代之中获得的。”<sup>3</sup>全盘农业集体化的起因是，由于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农民不肯按对自己不利的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1928年1月，斯大林到西伯利亚，要求富农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拒绝者被送交法庭审判，粮食被没收。斯大林还禁止粮食自由买卖，抛弃了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强调要加快工业化，向富农进攻，使苏联迅速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独立，认为农业和农村需要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劳动力，为此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教材以很大篇幅描绘了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斯大林关于农村向社会主义强制集体化过渡的做法引起了强烈不满，仅1929年12月就有近1万名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和集体农庄积极分子被打死。《大转变的一年》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伏尔加河沿岸、北高加索和乌克兰、西伯利亚等地农民的不安，不少于100万人进行了抵制，抵制的形式之一是大规模屠宰牲畜。”<sup>4</sup>到1930年代末，苏联出现了25万个集体农庄，农民被改称为集体农庄庄员。“集体化解决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农业劳动完全由国家监控。集体农庄成为满足城市和工业化所需粮食和资金的提供者。国家采购的谷物量提高了（集体化开始前每年平均为1100万吨，1932年达到1850万吨）。其中的约四分之一被用于出口，在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了。直到1930年代末，粮食的产量才达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水平。肉和牲畜的产量则低于一战前的水平。”<sup>5</sup>

斯大林时代是充满矛盾性的时代，“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苏联的发展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工业现代化、文化革命、教育与科学的发展，以及广大社会阶层职业的改变和职位的上升（‘社会电梯’）在加快，人们的热情和公民的社会积极性提高，1936年的新宪法确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但另一方面，民主萎缩、意识形态审查强化、出现了对‘人民的敌人’的搜查和大规模的政治镇压，其高潮出现在1937年与1938年。”<sup>6</sup>“镇压被用来刺激工业的增长速度。为此，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理论，在完不成定额、生产中出事故、居民报怨物质情况变坏时，就从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中搜查‘破

---

<sup>1</sup> 大鸨版教材，第95页。

<sup>2</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5-6页。

<sup>3</sup> 大鸨版教材，第150页。

<sup>4</sup> 大鸨版教材，第103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110页。

<sup>6</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6页。



坏分子’。”<sup>1</sup>社会主义建设消除了1920年代的失业问题，机关扩大并逐渐形成了在册权贵——高层管理者，他们掌握着国有经济和财富的分配权，能够获得短缺商品。

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用了四年零三个月。但事实上许多指标并没有达到（对此并没有说）。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经济，效果并不佳——1933年初，工业生产的年增长速度降至5%。尽管如此，‘工业化跃进’成了现实，苏联开始赶超主要强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苏联建立了7500多个大企业，其中包括大型冶金工厂、机器制造企业和电站，生产出许多以前不能生产的产品，如制造飞机用的铝等。交通网被扩展，1940年的铁路里程达10.61万公里（1913年5.8万公里），并建设了莫斯科地铁和运河。苏联变成了工业强国，工业品的产量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世界工业品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1913年的2.6%升到了1937年的13.7%。

工业化的成就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农业发展滞后、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以及严重的饥荒。“集体化对农业的打击使其无法克服1931年至1932年欠收的后果，苏联的南部州出现了可怕的饥荒。媒体被要求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对这一悲剧不能提只字片语。国家没有向饥荒地区提供任何帮助。据不同研究者提供的资料，1932-1933年间，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有270万至450万人被饿死。”<sup>2</sup>“尽管许多地区发生了饥荒，为了获得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国家仍出口了1800万吨粮食。苏联各地因饥饿丧生的人达700万。与1926年人口普查相比，1937年人口普查显示，人口减少了1030万人（下降了9%）。”<sup>3</sup>“社会主义在各个战线上全面进攻’是相当具有矛盾性的，苏联人建立了数千个大企业，组建了新的工业部门，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不是为了保障居民的食品、日常工业品和住房的供应，而是被用于生产钢铁、机器设备和武器。集体化造成了巨大的牺牲和农业的悲剧性后果。”<sup>4</sup>“1929年起，凭证供应制被确立下来，面包、黄油、糖及其他食品需要凭证购买。但是，在1.6亿人中，能够拿到票证的人只有4000万。直到1935年1月1日，票证才被取消。”<sup>5</sup>

在推进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斯大林模式的苏联体制最终定型。“集体农庄体制成为行政命令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保障了国家的最低粮食需求，这些粮食被用于满足城市需要和出口。1930年，国家收购的粮食量较1928年增加了一倍，出口粮食保障了工业品的进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企业使用的85%的机床和机器是从国外进口的。”<sup>6</sup>“斯大林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强化行政指挥方法和高度中央集权基础上的。”<sup>7</sup>“斯大林的专政成为苏联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个人专权与苏联宪法和法律确定的民主制原则相悖。纸面上的和官方讲的内容脱离生活实际，是苏联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苏联形成了联共（布）领袖的专政，没有领袖的同意就不可能通过任何决议。斯大林的命令和指示不必经过讨论，必须无条件执行。领袖专政依靠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他的忠实战友（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古比雪夫、莫洛托夫）执行。”<sup>8</sup>1952年苏共十九大改变了党名和组织结构，“但是，像从前一样，主要问题都是由斯大林及其‘四人’小圈子（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决定的。”<sup>9</sup>“1930年代，苏联建立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其特征是：管理中的过分中央集权、领袖专政、由党的机关代行苏维埃的权力、迷信行政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在工业化跃进的同时，古拉格集中营被建立起来，犯人的强

<sup>1</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127页。

<sup>2</sup> 大鸨版教材，第106页。

<sup>3</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138页。

<sup>4</sup> 大鸨版教材，第150页。

<sup>5</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128页。

<sup>6</sup> 大鸨版教材，第106页。

<sup>7</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127页。

<sup>8</sup> 大鸨版教材，第113页。

<sup>9</sup> 大鸨版教材，第211页。

制劳动被使用。”<sup>1</sup>

苏联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对列宁，另一种是对斯大林。列宁的遗体仍存放在其墓穴室中，斯大林则被说成是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抑或就是今天的列宁。“官方的宣传把苏联的一切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个人。斯大林建立了个人集权制度，党和国家机关都要服从于他的意志。领袖专政与大规模的镇压，同民主原则和苏联宪法的规定根本矛盾。”<sup>2</sup>

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镇压受到谴责。大鸨版教材用的题目是“大恐怖的机器”，教育社版教材的题目是“镇压政策”。“镇压的高潮是在1937年、1938年，在这两年间，有160万人被捕，其中的68万人被处死。”列宁的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经济机关和共产国际、军队的许多领导人被处死。被卷进大清洗机器的还有前沙皇军官、神职人员、富农、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反对朝鲜人、德意志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等人的“民族战役”被打响。从社会成分看，遭到镇压的主要是农民、工人和小职员。<sup>3</sup>但是，教材没有给出遭镇压的具体人数。

#### 四、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的行为赞赏不多

在卫国战争这章，教材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苏联军民的英雄主义。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苏联军民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二是卫国战争对人类的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全部损失的70%-80%是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对反法西斯同盟取得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胜利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对于苏联来说，这是一场保卫自己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全民的、卫国的、神圣的战争。在纳粹的威胁面前，社会团结起来了。爱国热情、前线与后方的团结是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纳粹制造苏联各族人民不和的企图没有成功。”<sup>4</sup>“卫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被称为卫国战争不是偶然的：苏联人民面临的是祖国的命运问题。希特勒的种族学说认为，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应该是‘被消灭’的‘非人类’。德国对苏联的战争是‘非常规的’，具有异常的残酷性。战争的胜利体现了苏联人民的英勇功勋，使全人类摆脱了法西斯的威胁。”<sup>5</sup>教材对斯大林的军事指挥着墨不多，突出了朱可夫等军事将领的作用。

教材没有把卫国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斯大林个人，而是强调了军人的英雄主义。教材基本没提及斯大林的英明指挥，反而提到，斯大林在战争初期不顾苏军遭受的巨大损失，一味强调要反攻：“朱可夫反对苏军同时在三个战略方向上发动进攻，认为没有为此可动用的预备队。但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他仍做出了在所有方向上发动进攻的决定，进攻方向分散和没有最起码的预备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失败。斯大林认为，德国人将于1942年春夏间向莫斯科发动新的进攻，命令将相当规模的后备力量集中到西面。相反，希特勒却将南方作为主攻方向，战略目标是控制伏尔加河下游和外高加索”<sup>6</sup>教材突出了各个战场上将领的指挥和官兵的英勇，认为在战争初期的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战中，苏军的顽强战斗延缓了德国军队对莫斯科的进攻。莫斯科会战使德国遭受了首次大失败，巩固了反法西斯阵营，“在莫斯科会战中，朱可夫、科涅夫、罗克索夫斯基等军事将领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但是，争取胜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苏军总共损失超过了180万人，德军损失了61.5万人。”<sup>7</sup>教材强调，前线与后方是统一的战线。苏联人的爱国主义热情

<sup>1</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6页。

<sup>2</sup> 大鸨版教材，第150页。

<sup>3</sup> 大鸨版教材，第115页。

<sup>4</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6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205页。

<sup>6</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2册，第25页。

<sup>7</sup> 大鸨版教材，第160页。

高涨，1941年向东方搬迁了2500家企业，疏散了1700万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全国迅速转入战时体制，成为大军营。后方也承受了很大痛苦：12小时工作制、凭证供应、供应量低、饥饿等等，各行各业的人都对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个敏感话题，教材认为：“在很长一段时期，苏联人认为，胜利要归功于斯大林。是的，斯大林是最高统帅，是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他成了胜利的象征。是的，斯大林有军功，但由于镇压军队中的指挥员、由于1941-1942年的失利，由于战争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他对国家和人民也有罪。至于哪方面更多一些，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每个人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评判是明摆着的。”“没有千百万军官、士兵、医务人员、游击战士、后方劳动者的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精神，能取得胜利吗？没有英雄们，没有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和潘菲洛夫师的战士，没有‘列宁格勒狭地’和斯大林格勒巴甫洛夫小屋的保卫者，没有马特罗索夫和库尼科夫，能取得胜利吗？关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属于那些为此做出贡献的人，属于苏联全体人民。”<sup>1</sup>“苏联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根源，是前线和后方的苏联人民空前的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胜利也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战争夺走了近2700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1000万士兵和军官），在敌后牺牲了400万游击战士、地下工作者和平民。超过850万人遭到法西斯奴役。”<sup>2</sup>代价还包括自己造成的，斯大林以有人与占领者合作为名，惩罚了许多民族，办法就是把整个民族迁走并取消其民族自治单位，“饥饿、寒冷和疾病造成了大量伤亡，迁移造成高达14.4万人丧生，其中包括半数的卡尔梅克人，二分之一的保加利亚人，三分之一的卡拉恰伊人。这些残酷的镇压在战后引起了长时间的民族运动新浪潮。”<sup>3</sup>

关于斯大林搞的“东方战线”，教育社版教材的描述很简略，只用了两页篇幅，没做评论，但大鸨版教材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还做出了评价。“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外，苏德还达成秘密备忘录，划分了欧洲的势力范围。这一协定使苏联获得了波兰的一部分，包括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此外，德国承认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芬兰和比萨拉比亚（1918年划归罗马尼亚）的特殊利益。”<sup>4</sup>“按以往的看法，互不侵犯条约本身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众所周知，这个协定为希特勒侵略波兰‘开了绿灯’。在许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看来，这促使希特勒产生了报复的想法，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尽管苏德协定使苏联暂时摆脱了希特勒侵略的威胁，但对德国在欧洲实现其军事政治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条约的签署者，这个协定通常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苏共领导人长期否定这一秘密协定的存在，直到1980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协定的文本才被公开。”<sup>5</sup>在苏德关系方面，教材指出了苏联的失误，在执行苏德经济协定时，苏联比德国积极。1941年11月德国还建议苏联加入三国协定，但由于两国分歧明显，特别是1941年4月5日苏联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友好和互不侵犯协定，此事才作罢。

**对于枪杀波兰军官一事，教材没有回避。**“苏联的计划注定了波兰军官的悲剧命运。他们被分配在5个集中营里，最著名在卡廷（斯摩棱斯克州）。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的命令，这些集中营中的波兰战俘，有21857人被枪决。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不承认是苏联的错误导致了这些波兰战俘的死亡，第一次承认此事是在改革时期。2010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卡廷悲剧及其牺牲者》的声明，正式宣布在卡廷发生的大规模枪决事件是斯大林

---

<sup>1</sup> 大鸨版教材，第203页。

<sup>2</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2册，第65页。

<sup>3</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2册，第54页。

<sup>4</sup> 大鸨版教材，第139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140页。

制度的罪行。”<sup>1</sup>

**谴责苏芬战争。**教科书为苏联的对芬政策作了辩护：“当时的对芬政策取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担心第三方利用芬兰的领土反苏。”“1939年11月30日，苏联红军越过卡列利阿地峡的边界，发动了被称为‘冬季战争’的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940年3月12日苏芬协定的签署。红军在极其严寒的情况下作战，在进攻敌人防线时没有取得显著的战绩。在付出巨大牺牲后，苏军最终占了优势，迫使芬兰把自己的领土让给苏联。”“‘冬季战争’对苏联影响很大：苏军牺牲的人数是芬兰军队的两倍，牺牲和冻伤的人数也多于芬兰。战争导致苏联外交陷入孤立：苏联被开除出国联。芬兰由于损失了大部分领土而与德国接近，并在1941年6月参加了对苏战争。”<sup>2</sup>

教材没有回避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的压力下与苏联合并的问题。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吞并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在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后，在三国国内逮捕和驱逐了4万人。在苏联西部新占领的地区，总计有38-39万人遭到驱逐。“如果说最初相当一部分居民曾打算与新政权合作（或者与新政权达成妥协），在这些镇压运动后，反苏的情绪广泛扩展。”<sup>3</sup>闪电战开始后，希特勒的军队南有罗马尼亚军队、北有芬兰军队的配合，这是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所直接导致的。

有一种说法：希特勒是被迫进攻苏联的，因为斯大林准备进攻德国。对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文献并没有依据，希特勒进攻苏联则可以从《我的奋斗》中找到根据，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原因主要有三：为德国人争取生存空间、消灭低等种族、仇视布尔什维克制度。<sup>4</sup>

**战争初期的悲剧错在斯大林。**“苏联情报人员不止一次地提醒，希特勒计划对苏联发动军事进攻，并指出了进攻的准确时间。这些情报中，最著名的是由在日本的特工佐尔格所提供的，但斯大林不相信他，而只相信自己的预测，认为情报人员提供的消息不可信。根据斯大林的预测，希特勒不会两线作战：既与英国也与苏联作战。”<sup>5</sup>战争初期，苏军的失利严重，大量官兵被俘，仅基辅战役就损失了60万人。

**承认美国援助的作用。**“1941年10月，美国开始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技术、军用物资、装备。通过伊朗、远东、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运输渠道，美国在1941年10月到1942年6月期间，共向苏联提供了3000架飞机、4000辆坦克与20000辆汽车。这些物资在苏联军事工业下降时期显得特别重要，弥补了苏联国防工业的不足。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持续提供了技术和物资。”<sup>6</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发展仍然是充满矛盾性的。一方面，胜利巩固了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另一方面，从前线返回的人希望改革：解散集体农庄、增加工业投入、提供日用消费品，以及消除官僚主义。民众的这种情绪威胁到了政权的稳定，于是，新一轮镇压开始了：列宁格勒案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医生案件等。<sup>7</sup>在社会政策方面，苏联有了进步：恢复了8小时工作制，1947年取消了凭证供应，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选举流于形式，但其结果却被解释成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广泛支持。党员数量增加，尽管大量党员在战争中牺牲，党员人数还是达到了600万。战争消耗了苏联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苏联抓了370万德国战俘和60万日本战俘充作劳动力。经过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经济恢复了73%，恢复和新建了6200家

---

<sup>1</sup> 大鸨版教材，第145页。

<sup>2</sup> 大鸨版教材，第146页。

<sup>3</sup> 大鸨版教材，第147页。

<sup>4</sup> 大鸨版教材，第153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154页。

<sup>6</sup> 大鸨版教材，第179页。

<sup>7</sup> 大鸨版教材，第210页。

大企业，但农业的情况不好，1946-1947年发生了饥荒。

对于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教材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旨在加强控制，“1947年，苏联政府倡议欧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晤，并在会上宣布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主要目的是监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48-1949年，南斯拉夫由于反对莫斯科的蛮横要求而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其领导人铁托被称为‘杀人犯和间谍’。”<sup>1</sup>苏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则以斗争为主，柏林危机推动了北约的成立，朝鲜则发动了侵略南朝鲜的战争。“1945年至1953年，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挑战，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向，斯大林试图加强其在本国和世界上的地位。苏联处于这一共同社会进程的轨道上，只是由于政治保守而未能找到应对挑战的对策。”<sup>2</sup>

## 五、对赫鲁晓夫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党内斗争中胜出，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教材都否定了赫鲁晓夫将国家和党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做法，但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和平反，以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社会民主化进程。教育社版教材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评价则高于大鸨版教材。

教材都肯定了赫鲁晓夫平反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的积极努力，但也指出了其平反的不彻底性。在斯大林去世之初，苏联政府就开始部分平反和释放被关押者，对此，苏共领导层的观点并不一致。“赫鲁晓夫不顾自己党内同事的意见，决定公开揭发斯大林的罪行。195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大闭门会议上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列举了斯大林对党内精英、普通党员、红军指挥员和知识分子代表的犯罪行为。但是，报告并没有提及关于反对派、强制集体化、1932-1933年饥荒、利用劳改营犯人劳动等问题。因此，党的第一书记并未提及制度的主要受害者——千百万普通的苏联公民。”<sup>3</sup>苏共二十大推动了平反进程，“从1956年至1961年，差不多70万人（是1953年至1955年的10倍）获得平反，这不仅意味着释放了这些人，还意味着对他们个人名誉的恢复。被平反者中，不仅有千千万万普通的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也有许多党和军队的知名活动家（布柳赫尔、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科秀尔、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但是，1920-1930年代提出国家发展不同道路选择的党的活动家，如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等人并没有得到平反，他们的支持者也没有获得平反。<sup>4</sup>被驱逐的部分少数民族获得了平反，获准返回家园，部分民族恢复了自治区的建制。

教材也指出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产生的负面影响：“揭发斯大林主义的做法在苏联社会播下了异端的种子，党的绝对正确的决定受到质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裂。在苏联，相当一部分党的工作人员，即那些在斯大林时期开始职业生涯者，开始对非斯大林化进程发动进攻。”<sup>5</sup>为了消除苏共二十大的一些消极后果，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教材认为这个决议是从秘密报告立场的后退，个人崇拜的出现被归咎于领袖的个人性格，斯大林被说成是卓越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其意图被解释成保障社会主义胜利，文件认为个人崇拜虽然阻碍了社会发展，但没有改变苏联制度的性质等，“这一文件成为后斯大林时期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sup>6</sup>

教材认为，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是苏联经济快速发展

<sup>1</sup> 大鸨版教材，第219-210页。

<sup>2</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1册，第7页。

<sup>3</sup> 大鸨版教材，第226页。

<sup>4</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2册，第117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226页。

<sup>6</sup> 大鸨版教材，第227页。

的时期，1950年代不仅出现了德日经济发展的奇迹，还出现了“苏联经济奇迹”。“从1950年代开始，苏联实现了自身发展中的一次战略跃进”，“从发展速度看，苏联的GDP增速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1953-1964年间，苏联新建了8070家企业，有7.146亿平方米的住宅被投入使用，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0.3%。苏联的人口总数在1953-1964年间从1.88亿增至2.267亿。1962年，苏联城市人口数（1.112亿）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1.086亿）。国家处于世界科技进步的先锋队中，首次开辟了通向宇宙之路，为实现超前的社会纲领创造了前提。”<sup>1</sup>“赫鲁晓夫的十年尽管有唯意志的、草率的决定，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但国家在工业现代化和社会领域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跃进。”<sup>2</sup>当然，苏联的经济奇迹也是相对的，其农业发展仍处于低水平，国民收入总体水平不高，赫鲁晓夫改变马林科夫发展日用消费品工业的方针，致使苏联经济比例的失调更加严重。

赫鲁晓夫实施了多项改革措施，如赶超美国、开垦处女地、种植玉米、管理体制改组、住房革命等，许多改革措施是草率的，也没有摆脱斯大林体制的限制，仍迷信于行政手段。“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改变政治方针，开启了苏联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是，他没有提出苏联在1930年代形成的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证明，当受谴责的是对体制的歪曲并应消除这种歪曲，以开辟通向未来共产主义之路。”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最终遭到了各个阶层的反对<sup>3</sup>，特别是党的机关，“赫鲁晓夫胆怯的、不能始终如一的步骤，引起了那些担心自己既得利益受损者的担忧。党的机关工作者（不仅是那些在贝利亚倒台后返回岗位的人，还有在赫鲁晓夫当政后巩固自己地位的人）积极反对改革，不再担心被镇压，更想稳定自己的地位。”<sup>4</sup>教材对赫鲁晓夫急躁冒进做法是否定的，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第三个党纲，则被认为是最后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苏联最重要的成就在军事领域，人造卫星、破冰船、对北极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但人文科学的情况不好，受马克思列宁理论框架限制，人们没有思想自由，不能研究社会发展进程，不能讨论各种现实问题。“对苏共领导人的公开批评被禁止，因此，人们在咖啡馆、茶馆和家庭厨房进行讨论。这些场所起到了俱乐部的作用，讨论内容涉及社会新闻，文化生活与争论，读半禁的书。”<sup>5</sup>1960年代，苏联出现了非政府组织，“社会上对政权不信任的情绪在增长。新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被经常讨论，1962年发生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和1963年由干旱引发的粮食困难，以及向集体农庄庄员私人经济的进攻，可以被视为转折点。”<sup>6</sup>1961年，俄罗斯刑法典增加了反苏宣传罪。

## 六、谴责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稳定

教材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最低，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勃列日涅夫改变了赫鲁晓夫的政策，以“干部稳定”为主要口号，导致了特权阶层的腐败和体制的固化。言行不一与恢复老旧的管理办法，导致官员数量逐年增加，苏联每6至7个人中就有一名管理者，到1982年，高层领导人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祖国历史上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常常被称为‘停滞’，因为在这一时期，精英没有变化，掌权者老化、不再关注时间的流逝，甚至相应的评价都没有。这是一个在经济、科技、社会关系领域都出现停滞的时期，证明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和思想政治体制的潜力

---

<sup>1</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2册，第143页。

<sup>2</sup> 大鸨版教材，第236页。

<sup>3</sup> 大鸨版教材，第228页。

<sup>4</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2册，第118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250页。

<sup>6</sup> 大鸨版教材，第252页。

已经被耗尽。”<sup>1</sup>“对于社会主义体制来说，镇压的方法不能促进国家潜力的有效发挥。由于缺少民主程序（选举制度），精英的更迭大多通过肉体消灭（大恐怖）的办法实现，而不再镇压则导致干部队伍僵化，精英的保守化、干部的老化，无法回应时代的挑战。”<sup>2</sup>“苏联的外交政策虽然取得了‘缓和’的成果，但耗费很大，没有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苏共失去政权和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sup>3</sup>“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体制的保守、党的机关统治的强化，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的逐步形成。”<sup>4</sup>勃列日涅夫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拒绝改革，并制造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克格勃建立了专门机构，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军工综合体得到发展，但不适应科技革命，使劳动生产率落后于西方，统一的苏联人没有变成现实，出口石油天然气成为主要财源，食品和日用品则需要进口。

教材对苏联体制进行了反思，“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劳动生产率低。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私人经济活动能够保障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官僚化的管理总是输给私人经济。官僚指挥体制不能使科学和技术成果迅速用于生产。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阻碍了科技进步。”“在生产资料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缺乏社会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基础，因为经济主体的竞争是民主和自由的物质前提。”“任何社会实践（无论是宗教教派还是社会制度），如果建立在某种人为制造的学说基础上，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怀疑者的斗争与对自由的否定。这一斗争通过不同形式展开：从意识形态‘教育’到大规模镇压。”<sup>5</sup>“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危机日趋明显。”<sup>6</sup>

## 七、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解体的论述比较平和

两本教材都没有过分谴责戈尔巴乔夫，强调他的改革是对苏联体制危机的回应。教材也没有像中国某些人那样，把苏联解体归咎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或者是戈尔巴乔夫搞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从体制和政策失误上寻找原因。

大鸨版教材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着墨不多，总共才有15页，教育社版教材的论述则使用了较长的篇幅，共有30页。教材强调，正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使苏联爆发了体制性危机，至1980年代初，苏联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还落后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失去了1960年代的速度优势。在信息技术方面，苏联的落后尤其明显，“甚至到了1990年代初，苏联人均拥有电子计算机的数量只是南朝鲜的十分之一，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同以前一样，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优势的是采掘和燃料工业，依靠科技进步的经济所占的比重只有38%，而在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数字为55%-65%。”<sup>7</sup>正是国家的危机迫使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苏联历史的最后阶段以‘改革’闻名，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危机迫使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的领导人走上了‘革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苏联本身存在的问题被暴露。1991年的8月事件最终导致苏共活动终止和苏联解体。”<sup>8</sup>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走上“革新社会主义”之路是值得肯定的，但改革暴露了社会主义和苏联本身存在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新作风，让人们燃起了希望，但他缺少领导国家工业的经验，对军队和外交也

---

<sup>1</sup> 大鸨版教材，第267页。

<sup>2</sup> 大鸨版教材，第271页。

<sup>3</sup> 大鸨版教材，第278页。

<sup>4</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2册，第147页。

<sup>5</sup> 大鸨版教材，第270页。

<sup>6</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2册，第174页。

<sup>7</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7-8页。

<sup>8</sup> 大鸨版教材，第300页。

很外行，“他没有提出明确的行动计划，而是把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原则、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结合看成是革新体制，用行政措施加强秩序和纪律，最重要的是活跃‘人的因素’。”<sup>1</sup>戈尔巴乔夫在许多领域延续了安德罗波夫的政策，他把酗酒看作劳动生产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在1985年3月开始了反酗酒运动。这项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而制定的政策，带来了严重后果。1980年代中期，这项政策给国家造成了800亿至1000亿卢布的财政损失。戈尔巴乔夫的其他许多政策，如发展机器制造业、搞国家订货等，也都没有成功。<sup>2</sup>

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加速战略的目标没有实现，生产效率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1987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实施加速战略的结果是加深了危机。国家还得需要大量资源来消除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亚美尼亚地震造成的后果。“改革最大的困难在于，领导层并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世界。领导层在提出加速战略方针的一年后，已经十分清楚，用诱人的口号无法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才开始研究经济改革纲领。”<sup>3</sup>在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没想搞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改革进展不大的原因并不在体制，而在于机关官僚的阻挠，因而开始反对保守主义，大量更新干部。然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好成果，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苏共才开始改革，效仿柯西金的改革制定了国有企业法、合作社法等，但都无法解决问题，最终决定向市场经济过渡。“1985年至1991年，苏联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道路是复杂的，这意味着完全废除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经济管理体制，但建立在激励物质生产者基础上的经济体制还没有被建立起来，结果，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崩溃了，新的却没有建立起来。”<sup>4</sup>

公开性、非斯大林化、平反、批评苏联时期的黑暗面，领导层努力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但流行的作品并没有为民众提供力量。<sup>5</sup>“公开性最初并未建立在损害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其口号是：‘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回到列宁！’公开性是号召建立‘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公开性并不意味着言论完全自由，而只是半自由——只能说领导允许说的，只能在被允许的界限内行事。”<sup>6</sup>1988年以后，在经济状况不好的形势下，出现了工人罢工、集会，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东欧剧变则给了反对派希望。这一时期，电视台搞了许多直播节目，激发了民众的政治热情，西方的电台不再受到干扰，新报刊纷纷出版，档案和禁书也开始对研究者开放，“这场新的信息风暴很快摧毁了建立在官方宣传基础上的制度神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进程早在6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在公开性的条件下，这一意识形态最终丧失了自己的主要功能，这一结果是改革的倡导者所完全没有料到的。”<sup>7</sup>

1989年春，苏联举行了人民代表选举，苏共的许多候选人未能当选，169名州党委书记只有32人当选，苏共在工业中心和许多民族地区遭到了失败。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意味着作为‘自上层’的革命性改革结束了。”<sup>8</sup>苏共失去了对民主化进程的控制，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上有跨地区议员团、下有民族共和国大众的压力。1990年2月，俄罗斯联邦举行了人民代表选举，爆发了大规模群众集会，苏共被要求放弃垄断权力，“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选举是1917年立宪会议被解散以后的首次真正的民主选举。结果是，民主派获得了最高立法机关三分之一的席位。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选举的结果反映了党的上层的危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规定苏共在苏联社会起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删除，国家开始形成多党制。”<sup>9</sup>1990年，民

<sup>1</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12页。

<sup>2</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14页。

<sup>3</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16页。

<sup>4</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19页。

<sup>5</sup> 大鸮版教材，第289页。

<sup>6</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20页。

<sup>7</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21页。

<sup>8</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27页。

<sup>9</sup> 大鸮版教材，第293页。



族运动持续发展，由于未能解决民族问题，苏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加剧。1991年2-3月，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举行了独立公投，加深了政权危机。1991年3月，苏联举行全民公决，有6个共和国拒绝参加。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发布了主权宣言，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克里姆林宫出现了两位总统，但他们改革的目标和方式不一样，戈尔巴乔夫依靠苏共，但苏共已经分裂成保守派与改革派，并受到叶利钦的打压，有三分之一的党员退党。1990年6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该党领导人坚持传统立场。1991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全党分裂成三派：激进改革派、革新派和传统派。党员人数从1985年的2100万缩减至1991年夏天的1500万。“但是，党的代表大会不仅没有能克服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sup>1</sup>“国家事态的发展表明，苏共权力的削弱和苏联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sup>2</sup>

为了维持联盟，戈尔巴乔夫在拟定的新联盟条约中给了加盟共和国较以往更多的权力，并决定于1991年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8月19日，强硬派建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全苏联实行紧急状态，但他们只掌握了三天权力。两本教材都认为此事加速了苏联解体，“8月事件加速了苏联解体。1991年8月25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并表示不会签署新联盟条约，白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则紧随其后，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除外。”<sup>3</sup>“1991年的8月事件，不仅意味着由列宁所奠定的、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党国’体制的终结，也意味着苏共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sup>4</sup>

两本教材都认为是新思维终结了冷战，认为苏联与美国的裁军进程缓和了全球和地区性的紧张局势，但都谴责戈尔巴乔夫对西方让步过多，其许多让步并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sup>5</sup>媒体则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做出的让步。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受到欢迎，获得了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但苏联国内的反响却是敌对和冷淡的。“从冷战中走出来的超级大国只有美国，苏联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解体了。”<sup>6</sup>

总之，在过去的100年中，俄罗斯经历了两次国家解体（一次是俄罗斯帝国，一次是苏联），两次大的战争（一次是内战，一次是反法西斯战争），遭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两本教材都认为，在过去的100年里，国家走过的道路充满了英雄业绩，也遭遇了可怕的悲剧，有令人骄傲之处，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研究和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确定未来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选定了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是一条反对激进革命、追求渐进式发展、遵循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观的道路。因此，教材总体上否定了苏联体制，也否定了苏共领导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

<sup>1</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29页。

<sup>2</sup> 大鸮版教材，第295页。

<sup>3</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40页。

<sup>4</sup> 大鸮版教材，第298页。

<sup>5</sup> 大鸮版教材，第292页。

<sup>6</sup> 教育社版教材，第3册，第35页。

## 【论 文】

# 论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形成、发展与终结\*

张玉艳 杨恕\*\*

**内容提要：**19世纪中后期，俄国出现了以梅尔加尼、纳吉利、费兹汉尼等为代表的突厥语民族改革家，他们推动了俄国突厥穆斯林的民族自觉意识。在此背景下，迦斯普林斯基形成了自己对俄国突厥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教育等新思想，并成为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导人。扎吉德运动和全俄穆斯林大会，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两个主要载体，但二者之间相对独立。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结束后，由于帝俄政府采取限制性政策，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走向终结。

**关键词：**俄国突厥穆斯林 全俄穆斯林大会 俄国民族问题 扎吉德

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社会状况的学术成果中，国内外学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泛突厥主义”，而且经常把它归入“社会运动”的范畴。所谓“社会运动”，是指一种促成或阻止社会变迁的集体努力，是有组织的一群人，有意识、有计划地改变或重建社会秩序或文化的一种功能，涉及一般的社会关系、群众共同思想以及集体行为等问题。<sup>1</sup>泛突厥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俄国鞑靼族知识分子当中，但将其广泛传播的则是奥斯曼土耳其，至少在俄国和后来的苏联，泛突厥主义从未达到社会运动的程度。这便是本文使用“突厥穆斯林运动”而不使用“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原因。当然，在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泛突厥主义的作用。

## 一、 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穆斯林问题，一直是俄国官方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基本原因在于穆斯林群体在俄国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穆斯林是帝俄仅次于东正教信仰群体的第二大群体，有约1400万人。到1917年，俄国境内的穆斯林增长至2000万人。俄国大部分穆斯林属伊斯兰教逊尼派，仅在今阿塞拜疆境内什叶派占多数。在俄欧洲部分，穆斯林约占当地居民总数的4%，主要分布在乌法省、喀山省、奥伦堡省、阿斯特拉罕省、萨马拉省。在俄西部和西伯利亚，穆斯林人数很少，但在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占当地居民的1/3，在中亚地区则超过了90%。<sup>2</sup>现在，穆斯林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宗教群体（2010年人口普查为1500万），而且由于穆斯林移民的到来、穆斯林较高的出生率以及俄部分民众改信伊斯兰教，俄罗斯穆斯林人数增长较快，有资料称，已超过2100万人。<sup>3</sup>也就是说，国土面积的缩小（苏联解体造成）并没有降低穆斯林群体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当前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重视俄国穆斯林社会的一个基本考虑，其中就包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的重新解读。

从研究历程来看，俄国官方和学术界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的关注，在不同

\*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1期，第159-179页。

\*\* 张玉艳，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博士、管理学院讲师；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sup>1</sup> 李天任、蔡顺慈：《中华百科全书》（典藏版），1983年，<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2257>

<sup>2</sup> Арапов Д.Ю.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описания, статистика). М.: 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 Академкнига, 2001. С.27.

<sup>3</sup> Сколько мусульман в России проживает? 10-06-2015. <http://fb.ru/article/189076/skolko-musulman-v-rossii-projivaet>

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立场。在 1860-70 年代的农奴制改革中，俄国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穆斯林民族精英参与政治议程的权利受到更多限制，不仅代表名额被大大减少，而且代表的选举也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监督；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俄国穆斯林当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鞑靼族当中，这也推动了知识精英走向成熟。当时，鞑靼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下诺夫哥罗德）和两个知识分子中心（喀山和卡尔加拉），它们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使俄国穆斯林迫切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这种情况与当时兴起的“穆斯林东方的觉醒”以及愈发紧张的国际局势，都使帝俄政府更加重视其境内的穆斯林问题，彼时出现的各种相关的官方调查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sup>1</sup>当时的学术研究比较薄弱，研究力量以鞑靼族知识精英为主，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从侧重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到逐渐侧重共同的民族身份（所谓的“突厥人”）的变化，但整体上还处于启蒙阶段。

苏联时期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和为政策服务的政治目的。这一时期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进行了民族识别划界和打击反苏的穆斯林武装力量，当时官方主导下的学术研究目的，是要逐渐弱化穆斯林的宗教身份认同。为此，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问题进行的研究就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是更多地强调俄国穆斯林历史上形成的区域和民族差异性及其影响；<sup>2</sup>二是 1930-80 年代，特别是二战和冷战时期，由于伊斯兰世界处于不同的对立阵营当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包括苏联穆斯林在内的广大穆斯林群体中非常激烈。特别是土耳其和一些西方国家，曾多次利用泛突厥主义思想拉拢苏联的穆斯林，因此，不少学术研究开始从历史角度批判俄国穆斯林、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思想。例如，在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下，А·阿尔沙鲁尼和 X·加比杜林在 1931 年出版的专著《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概论》中，就把泛突厥主义描述为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sup>3</sup>上述两个出发点具有相同的立场，即否定俄国穆斯林群体的整体性和历史作用，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应该指出的是，苏联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考虑，对泛突厥主义进行批判，有其合理性；但以此全盘否定俄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作用，显然是不合理的。对分裂主义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与生活在分裂地区的普通民众进行差异化对待，是非常重要的。

苏联解体后，新一轮的研究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近年来，以鞑靼族知识精英为主的一批突厥穆斯林人士，开始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不仅强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穆斯林整体的爱国意识，而且大有要为迦斯普林斯基、（泛）突厥主义、扎吉德运动、全俄穆斯林大

---

<sup>1</sup> 相关内容可参考 Хасаншин Г.Р. Проблема «татаризации» нерус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Волго-Ураль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 материалах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м делам 1914 г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2014. №.4.С.217-227; Арапов Д.Ю. Русский посол в Турции Н.В. Чарыков и его «заключение» по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1911г. //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и. 2002. №.2. С.48-164; Гусева Ю.Н.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тюрко-татар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отражение е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ОГПУ (1922-1923 гг.)// Известия Уфим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РАН. 2013. №.1. С.86-92;等。

<sup>2</sup>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 Касымов Г. Очерки по 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и антирелигиозному движению среди татар до и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Казань, 1932; Тарджемани К. Предыдущее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наш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слам маджалласы. 1925. №.5-6. С.194-204; Шигабдинов Р. Улама и реформы 1920-х годов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Pax Islamica. 2009. №.1(2). С.60-67; Набиев Р.А., Хабутдинов А.Ю.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20-1940-х гг. Ислам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Среднем Поволжье. Казань, 2002;等。

<sup>3</sup> Аршаруни А., Габидуллин Х.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р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М.: Безбожник, 1931. С.47.

会等正名的态势。<sup>1</sup>如鞑靼斯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明基梅尔·沙伊米耶夫（Минтимер Шаймиев）认为，“19世纪出现在鞑靼人当中的改革派扎吉德提倡革新伊斯兰教并对俄罗斯和西方文化开放，因此，俄国的伊斯兰教才变得更加世俗，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更加包容。”<sup>2</sup>近年来，他们每年都会举行一些与这些内容有关的活动。如，2005年11月在下诺夫哥罗德市举办了纪念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100周年研讨会，2006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则一直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场突厥穆斯林运动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它视为现今俄联邦突厥语共和国民族分裂主义的源头。究其原因，就在于泛突厥主义产生于这场运动，并屡次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统一构成威胁。这也是俄政府对任何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思想和行为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所在。在这个问题上，莫斯科金融法律大学政治学家А·Б·季科夫（Диков А.Б.）认为，这场运动为俄联邦几个主要的突厥语共和国（鞑靼斯坦、巴什基尔斯坦、萨哈/雅库特/）的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上升提供了重要基础。他指出，通过这场运动，帝俄时期的突厥穆斯林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虽然起初这种认同没有对帝俄的国家统一构成巨大威胁，但在政治化后的泛突厥主义的长期宣传之后，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2000年代俄罗斯中央化进程的不完善以及突厥语共和国地区政治家忠诚度不高，民族分裂主义在这些共和国境内得到发展；俄联邦法取消这些共和国的地区总统任期制和2016年7月通过的一套全新的反恐法，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共和国境内潜在的泛突厥主义和主权化支持者。<sup>3</sup>俄罗斯学术界呈现出这种状况，不仅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和立场不同。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国际局势、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和主要突厥语民族的发展，俄罗斯学术界势必会作出更多的回应，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分歧，其中就包括如何评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

## 二、 俄国突厥穆斯林的觉醒

在俄国穆斯林社会中，操突厥语的民族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一共同的身份并未被特别强调，而是默默地存在着。到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突厥学研究的兴起，特别是受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1839-1876年）的影响，俄国穆斯林精英在越来越感受到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压力的同时，开始尝试从突厥语民族身份中寻找出路。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代对俄国喀山鞑靼人的重要影响。因为对他们而言，坦齐马特改革不仅是一场效仿西方的伊斯兰近代改革运动，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宗教的基础<sup>4</sup>，更为重要的是，它恢复了奥斯曼自由主义者与喀山鞑靼族改革家之间的传统关系和联系，

<sup>1</sup>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Гилязов И.А. Германская Служба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Востоку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ечат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сред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15. №.2 (44). С.103-115; Iskander Gilyazov I. "Foreign People" in the Perception of German Scientist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Muslims of Russia as an Object of Study// Terra Sebv. 2016. №.8. P.335-344; Матвее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й кавказ: от прошлого к настоящему».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2014. С.79-95; Сагушиева Л.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для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статуса мусульм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13. №.1. С.39- 43; Арапов Д.Ю.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восток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В. Фрунзе// Исла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2016. №.3(12). С.127-138; Гусева Ю.Н. Борьба за женщину: татарка-мусульманка в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практиках средневожских исламских общин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 Женщин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2012. №.4. С.72-78;等。

<sup>2</sup> Минтимер Шаймиев. У России нет «третьего пути»// Республика Татарстан. 2002. №. 46-47(24602).

<sup>3</sup> Диков А.Б.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 и институты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тюрк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ах Росс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этап//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6. №.4. С.101-112.

<sup>4</sup> 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尤其是在教育领域。<sup>1</sup>鉴于此，阿雅斯·伊沙基（Ayas Ishaky, 1878–1954 年，鞑靼民族运动家、作家、政论家）在描述当时突厥语世界出现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加强时，非常直白地说：“在反抗守旧落后的传统中，鞑靼进步人士从奥斯曼土耳其的改革中找到了精神支持”。<sup>2</sup>但是，与在行政、财政、司法、教育等社会各领域进行改革的坦齐马特改革不同，由于俄国社会条件和鞑靼人自身力量的限制，鞑靼改革家们关注的重点是宗教、教育和历史问题，并对突厥民族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影响力较大的改革家有希哈别金·梅尔加尼、凯尤姆·纳吉利、胡赛因·费兹汉尼等。

神学家、历史学家希哈别金·梅尔加尼（Сихабеддин Мергани 或 Шигабутдин Марджани, 1818–1889），是当时在俄国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家。喀山鞑靼人梅尔加尼，20 岁之前一直在其父亲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学习，之后到中亚的两大宗教中心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求学。求学中亚期间，梅尔加尼开始反对当地阿訇的教条式教学，并积极参与神学问题争论，提出了神学与宗教分离和回归原始伊斯兰教两大目标<sup>3</sup>，这对他后来提倡的伊斯兰改革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梅尔加尼的主要贡献，是努力使伊斯兰教在突厥人的生活中摆脱国家（集权化）的控制，认为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方式。此外，梅尔加尼最早提出了伊斯兰教可以与西方共存的观点，呼吁恢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整体而言，梅尔加尼学说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以下六大原则：（1）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找出古兰经里提出的宗教问题的答案；（2）应该从小学开始教授古兰经、哈底斯（即《圣训》）和伊斯兰教历史；（3）必须回归伊斯兰教的本源；（4）应该停止盲目服从；（5）应该清除中小学里形式主义的、中世纪的教学大纲；（6）欧洲知识和使用俄语教学不应与穆斯林教育相冲突。<sup>4</sup>梅尔加尼的思想在怀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喀山鞑靼人上层当中影响很大，特别是鞑靼商人。由于鞑靼商人的足迹在 19 世纪下半叶已遍布俄国全境，因此梅尔加尼的思想逐渐传播到了俄国东部、哈萨克草原、突厥斯坦等地。事实上，梅尔加尼是第一个反对形式主义的宗教仪式和禁锢妇女的人，也是第一个研究鞑靼突厥母语的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俄国的鞑靼人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民族复兴运动。

凯尤姆·纳吉利（Кайюм Назири 或 Абдул Кейюм Насири, 1825–1902 年）的思想，比梅尔加尼更进一步。纳吉利是一位接受过伊斯兰宗教学校教育的现代主义者、教育家、改革家和作家，曾在俄国东正教神学院教授鞑靼语，后在喀山师范学校附属鞑靼小学任教，<sup>5</sup>1871 年在喀山办学。在鞑靼民族复兴运动中，纳吉利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要保存并弘扬喀山鞑靼人的文学遗产。为此，他搜集了大量喀山鞑靼人的文学作品并汇编成了两本百科全书。第二，纳吉利在绘制鞑靼人日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帝俄政府禁止出版鞑靼语报刊后，纳吉利成为第一个用日历方式将他所收集的民族文学形象融合到大众印刷品中的人。利用这种宣传方式，纳吉利增强了喀山鞑靼人的民族自豪感，这也是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最后，纳吉利使用掺有奥斯曼语和察合台方言的喀山-鞑靼突厥语进行写作。他努力完善这一语言，使其成为标准语，使普通大众都能明白和使用这种语言。<sup>6</sup>此外，他还撰写了两本最早的鞑靼民族语言教材《鞑靼语音词典》和《语法教科书》，<sup>7</sup>因此被誉为鞑靼标准语的奠基人。

第三位著名的改革家是胡赛因·费兹汉尼（Хусейн Фейзхани 或 Хусаин Фаизханов，

<sup>1</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Алматы: Санат, 2006. С.154.

<sup>2</sup> Ayas Ishaky. Idel-Oural. Paris: Wschod, 1933. P.30.

<sup>3</sup> Lazzarini Edward J. Gadid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view from withi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975. №.2.

<sup>4</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2-153.

<sup>5</sup> Ауанасова А.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деи тюркизм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ред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естник Западн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 №.1.

<sup>6</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4.

<sup>7</sup> Ауанасова А.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деи тюркизм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ред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826-1866年)。费兹汉尼接受的是欧洲式的东方学教育，因此他宣扬鞑靼文化的西方化和教育体系、教学大纲的完全现代化<sup>1</sup>，企图借助的力量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sup>2</sup>例如，在《宗教学校改革》(Islah-i-medaris)一书中，费兹汉尼认为，应该在喀山开办按照欧洲模式教授伊斯兰教、俄语和世俗课程的高级学校。但是，在梅尔加尼看来，费兹汉尼的教育改革方式过于冒险，具有为俄罗斯化广开通道的危险。<sup>3</sup>尽管如此，19世纪90年代，费兹汉尼的支持者们还是在奥伦堡、喀山、乌法、托木斯克、维亚特卡省等地的伊斯兰宗教学校里，进行了教育改革实践，只是这些实践迅速融入了扎吉德运动的洪流之中。

努力追溯“伟大的过去”，也是鞑靼改革家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不仅宣扬伏尔加布加尔王国和喀山汗国的辉煌，而且还探讨蒙古帝国、金帐汗国、卡西姆王国、奥斯曼帝国对本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力图构建统一的突厥-鞑靼史，并逐渐形成了关于民族统一的历史根源和标准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历史根源和宗教构成了鞑靼人的统一。梅尔加尼在发出“鞑靼主义”的先声后，也把这一思想宗旨纳入了全突厥、全穆斯林的概念轨道上。这样，穆斯林突厥-鞑靼认同的观念，在这一时期鞑靼人的学术作品中就牢固地确立起来了。例如，Г·Ф·费兹汉诺夫(Г. Ф. Фаизханов, 1850-1910年，伏尔加河鞑靼穆斯林活动家)曾写道：“今天，生活在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坦波夫、奔萨、辛比尔斯克、萨马拉、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奥伦堡、乌法、彼尔姆、维亚特卡的所有的穆斯林，和生活在克里米亚、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的所有穆斯林，以及撒马尔罕、希瓦、浩罕、塔什干、突厥斯坦的当地民众，和高加索的一半穆斯林——上述所有人都来自同一血源、同一部落，是同一个突厥祖先的子孙”。<sup>4</sup>这种观点虽然根据不足，但却为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俄国突厥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是伴随着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宗教自决的兴起而出现的。在初始阶段，俄国突厥鞑靼社会改革运动的特点，是限于学校领域内的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实现教学方式和内容的现代化，拒绝并清除其中的经院式的和纯宗教的原则。<sup>5</sup>这种改革虽然也得到了某些开明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和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支持，但他们更加倾向于依靠新兴的突厥穆斯林资产阶级。完善教育体系和教育现代化，成为团结突厥鞑靼资产阶级的口号。尽管梅尔加尼、纳吉利、费兹汉尼等人在推进全俄突厥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还不是经验丰富的革新者，不是能把斗争目标坚持到底的组织者，因此他们不可能谋求领导地位。而且，当时俄国突厥穆斯林的觉醒尚处于内部对话和争论中，统一的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条件还不够成熟。

### 三、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形成

19世纪末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形成的标志，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梅尔·迦斯普林斯基(Исмаил Гаспринский, 1851-1914)成为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真正领导者。

在法国的留学经历、社会交往活动、与泛伊斯兰主义创始人哲马路丁·阿富汗尼的交往等，使迦斯普林斯基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强烈的世界竞争意识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sup>6</sup>与此同时，在与梅尔加尼、纳吉利等改革家的对话、博弈当中，迦斯普林斯基也获得了很多启发，特别是在

<sup>1</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4.

<sup>2</sup> Ауанасова А.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деи тюркизма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 сред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sup>3</sup> Mende G.v.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n Frage in der Sowjetunion.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36. S.45.

<sup>4</sup> Гафаров А.А., Галеева М.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татарско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й мысл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2. №.6. С.644.

<sup>5</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5.

<sup>6</sup> 张来仪：“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

宗教和教育问题上。整体而言，迦斯普林斯基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远离政治到参与政治斗争。迦斯普林斯基对帝俄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起初，他的思想具有很强的亲俄、亲政府性。例如，在俄国征服突厥斯坦前夕，迦斯普林斯基认为帝俄政府征服突厥斯坦完全合法，俄国应该吞并这个地区，因为俄国是鞑靼统治的继承者。他认为，在俄国，“突厥鞑靼部落的各个分支被塑造成其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状况使他预言，“俄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保留“伟大的基督教强国”的地位。<sup>1</sup>在他看来，俄国穆斯林的状况，要比西方列强的穆斯林殖民地好得多。后来，迦斯普林斯基开始批评帝俄政府对穆斯林民族的政策，认为帝俄政府并未深入认识到穆斯林的教育发展和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的问题。与此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反俄倾向明显的政治活动会受到最严厉的限制。<sup>2</sup>因此，为了让受众听到自己的言论，迦斯普林斯基不仅借助寓言题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坚持避免谈及政治的原则。但当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日渐高涨，迫切需要政治组织的引导，迦斯普林斯基顺势参与了全俄穆斯林联盟，并在其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

2、突厥穆斯林民族复兴与伊斯兰教的统一。迦斯普林斯基认为，伊斯兰教是突厥鞑靼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与梅尔加尼的观点很相似。在他看来，很难说在突厥鞑靼人中存在的民族性和宗教性中，哪一个更重要。一方面，迦斯普林斯基在抵制俄罗斯化中看到了民族存在的前提条件，为此必须使突厥鞑靼人的教育和生活西方化；另一方面，他明白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是未来的唯一出路。伊斯兰的发展趋势与民族的发展趋势混合在一起，只有在民族感形成后，两者之间的区别才会显现出来，而宗教统一也从未被遗忘过，因为伊斯兰教是突厥语民族最强大的武器和最重要的特点。<sup>3</sup>也就是说，突厥穆斯林民族复兴，既需要伊斯兰教力量的推动，也需要通过与伊斯兰教的差异来彰显。

3、以文化目标为主的泛突厥主义思想。泛突厥主义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主要副产品，同时也是迦斯普林斯基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接受了泛斯拉夫思想，并将其同泛伊斯兰主义的一些要素结合，创造出了一种适合于尚未成熟的鞑靼知识分子需要的泛突厥主义思想。作为“泛突厥主义之父”，迦斯普林斯基用“语言、行为和思想的统一”来界定泛突厥主义的文化目标。在他看来，泛突厥主义的目标，是使俄国境内的突厥语诸民族实现联合，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构建统一的标准语和文化，之后组建政治组织来争取民族复兴。<sup>4</sup>后来，他还认识到，从克里米亚到赫拉特、从君士坦丁堡到喀什噶尔的所有突厥人都支持的统一思想，是形成统一语言的基础。因此，迦斯普林斯基在统一思想和统一语言两个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在统一思想方面，迦斯普林斯基借助《译文报》和自己的著作，使泛突厥主义思想传播到广大突厥穆斯林地区。1883-1918年发行的《译文报》，是迦斯普林斯基表达思想的主要阵地，也是全俄突厥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国外读者的中央印刷品。通过《译文报》，喀山的任何一个突厥人都能知道其他突厥人的情况。与此同时，迦斯普林斯基不断进行文学创作，出版了多本著作。这些出版物的主题，以捍卫俄国突厥语民族的自由和文化发展权利为主。他宣扬俄国突厥语民族过去和现在历史、精神和文化的统一性，呼吁他们联合起来。<sup>5</sup>在统一语言方面，迦斯普林斯基为突厥语民族创造了结合奥斯曼土耳其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共同语言”，并坚决拒绝在“共

---

<sup>1</sup> Матвее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й аспект)// *Известия СОИГСИ*. 2015. №.15 (54). С.25-35.

<sup>2</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9.

<sup>3</sup> Mende G.v.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n Frage in der Sowjetunion. S.58-60.

<sup>4</sup> Аршаруни А., Габидуллин Х.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С.10.

<sup>5</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т. 9). С.157-158.

同语言”中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迦斯普林斯基创造这种“共同语言”，主要是为了出版《译文报》。可以说，《译文报》实现了“统一思想”和“统一语言”的结合。到1912年，《译文报》的订阅量达到5000份，读者主要分布在俄国、埃及、土耳其、伊朗等国，这也正是扎马勒金·瓦利多夫（Джамаледдин Валидов）称“这份小报的影响力要比《新时代报》甚至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力大上千倍”<sup>1</sup>的原因。

4、以新教学法为指导的突厥穆斯林教育改革。迦斯普林斯基从自身经验出发，在借鉴梅尔加尼、费兹汉尼等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按照欧洲模式进行学校教育改革的目标。他认为必须在中小学对所有儿童实施义务教育，而且学校应该实现现代化，应该用新教学法取代旧教学法。<sup>2</sup>为此，迦斯普林斯基编写了第一本使用新教学法的教材，于1884年1月在巴赫奇萨赖开设了第一所按照新教学法教学的实验学校，这是迦斯普林斯基对扎吉德运动的主要贡献之一。随后，俄国境内许多地区都开设了新教学法学校。正是在迦斯普林斯基的努力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学校开始用突厥语教授自然知识、历史、地理等课程，学生开始按年级分班，教室里出现了现代化的课程表、黑板、地图、杂志等教学工具。接受了迦斯普林斯基新教学法教育的学生，走向俄国各地并在那里开办新教学法学校，这使迦斯普林斯基在俄国突厥穆斯林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此外，迦斯普林斯基还提出了组织教育发展募捐机构、解放穆斯林妇女等口号，从而大大加强了突厥穆斯林教育改革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迦斯普林斯基对俄国突厥穆斯林民族自觉的思想贡献和实践推动，使他被称为“2000-3000万突厥人的精神之父”<sup>3</sup>，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扎吉德运动、全俄穆斯林大会等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最好的例证。

#### 四、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发展与终结

认为扎吉德运动是泛突厥主义的主要载体<sup>4</sup>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扎吉德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主要载体之一。因为扎吉德运动实际上始于梅尔加尼提出的俄国伊斯兰教改革思想，其主要支持者有纳吉利、费兹哈尼等人。迦斯普林斯基则向该运动提供了具体的方案，在他的领导下，运动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即在实践中首先发展人民大众的统一水平（развитие общего уровня народных масс）、实现教育现代化、统一语言、共同的文化进程。<sup>5</sup>当然，扎吉德运动的某些内容与泛突厥主义的主张比较相似，甚至有的内容直接源于泛突厥主义，但并不能因此就将扎吉德运动完全视为泛突厥主义的表现。有观点认为，殖民政府和传教士指控扎吉德人士宣传“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实际上是扎吉德人士对实施了数个世纪的“分治”政策的被迫回应，具有自卫的性质。<sup>6</sup>但是，笔者认为，扎吉德运动与泛突厥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之所以难以将它们分离，主要是因为迦斯普林斯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维系作用。因此，应该把扎吉德运动放到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这一更大的背

<sup>1</sup> Гафаров А.А., Галеева М.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татарско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ой мысл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С.644.

<sup>2</sup> “旧教学法”（усул-и кадим）的本质是，教学者认为用阿拉伯语背诵古兰经和其它宗教经典便足以获得知识，也就是说，用背诵记忆替代通过理解来掌握新知识。“新教学法”（усул-и джадид）则是基于阅读和学习的语言基础，来学习被排除在传统的穆斯林学校教学大纲之外的世俗课程。详见 Искандер Гилязов. Тюрк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основных этапов). Казань: Каза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С.15.

<sup>3</sup> Хабутдинов А. Исмагил бей Гаспринский// Федерализм. 1999. №.1. С.209-211.

<sup>4</sup> 张来仪：“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

<sup>5</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64.

<sup>6</sup> Назира Нургазина. Народы Туркестана: проблемы ислам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и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Алматы: Каза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и, 2008. С.143.



景下进行研究。

在 19 世纪中后期俄国鞑靼人觉醒之前，俄国突厥穆斯林精神文化统一性的整合基础是穆斯林学校。而到了 20 世纪初，扎吉德运动成了他们进行族际整合的有效因素。该运动涉及到包括宗教、文化、性别平等、非殖民化、国家建设等在内的很多重大问题。这一运动，以俄国突厥鞑靼人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主导，同时含有穆斯林统一的宗教因素和泛突厥主义的民族主义因素，后来还借鉴了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人的思想。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之前，该运动一直致力于消除俄国突厥鞑靼人的宗教和文化落后性。<sup>1</sup>后来，由于迦斯普林斯基引领了声势浩大的、以新教学法为指导的突厥穆斯林教育改革，扎吉德成员便在教育领域内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活动。据统计，到 20 世纪初，俄国境内已有 5000 多所突厥语民族学校使用迦斯普林斯基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它们都属于扎吉德学校。<sup>2</sup>在扎吉德成员看来，通过新教学法培养起来的、以民主观点和宽容性为特征的“新型穆斯林”，是唯一一股能够阻止穆斯林社会内部的敌对和非一体化，即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苏菲派和萨拉菲派等的力量。<sup>3</sup>与此同时，扎吉德运动有了更多的政治表达。例如，在突厥斯坦，扎吉德成员声称支持行政机构改革，要求更改 19 世纪 60 至 80 年代通行的法规，停止从俄国欧洲部分向突厥斯坦移民，减少对居民的征税等。但是，扎吉德运动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未能将各种不同的倾向和政治取向联合起来，而是充斥着诸如穆斯林改革学说、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甚至清教徒思想等多种因素，<sup>4</sup>如同一盘散沙，从而日益分裂，并随着迦斯普林斯基的去世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扎吉德运动的推动下，俄国主要突厥穆斯林民族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维吾尔人的穆斯林运动及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之间的合作也得到了加强，这在突厥穆斯林民族的文化复兴和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05 年俄国革命以后，突厥穆斯林运动在俄国进入了政治繁荣期，只是这一时期持续的时间较短。1904 年 2 月 8 日开始的日俄战争，激励了整个突厥语世界，尤其是在突厥鞑靼人的主要居住区喀山。在突厥鞑靼人看来，日本的胜利、俄国的精神和政治挫败，给了他们解决自身问题的机会。例如，日俄战争期间，他们成立了非法的政党“自由党”（Hurriyet）。该党宣扬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吸引了大量突厥鞑靼族知识分子。<sup>5</sup>正是俄国的战败和随后爆发的 1905 年革命，给了突厥鞑靼民族主义者公开并合法地宣传自己思想的机会。在喀山、克里米亚和周边地区、以及中亚等地，这种宣传引发了大量政治事件，使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进入了政治斗争的时期。

在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斗争中，突厥鞑靼人仍然表现得最为活跃。召开全俄穆斯林大会是突厥鞑靼人多年的梦想，他们终于在 1905 年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905 年 8 月 15 日，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在伏尔加河沿岸的下诺夫哥罗德召开。大会虽未获得政府批准，但却实现了伏尔加—乌拉尔地区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三大俄国突厥穆斯林精英群体的联合。与会精英大致代表了四个阶层：一是迦斯普林斯基、А·托普奇巴舍夫、Ю·阿克楚拉（喀山）、Ф·卡利米代表的全民族政治活动家；二是 Р·依布拉基姆、М·比基、Г·阿帕奈（喀山）代表的乌里玛和反传教宣传的活动家；三是 А·侯赛因诺夫、Г·侯赛因诺夫、В·亚乌舍夫、М·З·拉米耶夫代表的大资本家（城市团体领袖和慈善家）；四是 Т·М·捷福克列耶夫、С·Г·姜秋林、Ш·А·希尔特兰诺夫、С·Г·阿尔金（喀山）代表的穆尔扎（鞑靼贵族）缙

<sup>1</sup> Mende G.v. 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 Ein Beitrag zur nationalen Frage in der Sowjetunion. S.57.

<sup>2</sup> Хайрулдинов М.А. Этнопедагогика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иев: Науковий світ, 2002. С.116.

<sup>3</sup> Назира Нургазина. Народы Туркестана: Проблемы Ислам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и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еков). С.143.

<sup>4</sup> Абашин С.Л., Арапов Д. Ю и др.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8. С.280, 282.

<sup>5</sup> Ayas Ishaky. Idel-Oural. P.35.

绅和城市活动家。<sup>1</sup>大会决定组建全俄穆斯林联盟（Бүтөнрусие иттифак аль муслимин），迦斯普林斯基当选联盟主席，通过了建立总部位于巴库的执行委员会、并在突厥鞑靼人的其它居住中心建立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更像是一块“探路石”，会上没有反政府言论，甚至强调，必须在符合全俄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突厥穆斯林代表提出的目标。<sup>2</sup>10月17日，全俄穆斯林联盟宣言发布，标志着该联盟获得了合法地位。宣言第一条确定了“俄国各州穆斯林在社会文化政治需求和当代俄国生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联合的必要性”，认为“必须取消现行法令、政令和行政惯例对穆斯林做出的所有例外和限制，使穆斯林与俄国臣民在所有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上完全平等”；第二条确定了穆斯林精英的目标——“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和管理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该国的法律秩序”。<sup>3</sup>在政府没有追究的情况下，突厥鞑靼人便顺理成章地把全俄穆斯林大会当成了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又一个载体，准确地说，是进行政治斗争的载体。

在第一届全俄穆斯林大会召开前夕，根据1905年3月3日俄国沙皇颁布的诏书，俄国开始准备第一次国家杜马选举。“探路”成功后，突厥鞑靼人认为应该抓住杜马选举的契机，使突厥穆斯林运动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这就是他们于1906年1月在圣彼得堡召开第二届全俄穆斯林大会的主要目的。大会决定，在选举中把突厥鞑靼代表的选票与俄国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合并起来<sup>4</sup>，这在当时是加强突厥穆斯林政治发言权最明智、最现实的方案。第二届全俄穆斯林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1906年4月第一次俄国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有25名穆斯林代表当选国家杜马议员。<sup>5</sup>这两届全俄穆斯林大会做出的决定说明，“突厥穆斯林团结”的思想，没有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目的，特别是迦斯普林斯基在第二届大会上提出了“与俄国的历史联系是突厥同一性的轴心”的观点，<sup>6</sup>它们只会促进“俄国穆斯林有组织的统一”，在内容上包括有利于俄国穆斯林利益的改革方案。

第三届全俄穆斯林大会，于1906年8月在马卡里耶夫召开。由于国家杜马中穆斯林派系的斡旋，该次大会获得了政府的许可，因此第三届大会的参会代表多达800人，但与会者大部分是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鞑靼人。此次大会将全俄穆斯林联盟改组为政党，迦斯普林斯基、玉素甫·阿克楚拉等15名领导人，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大会提出了俄国所有公民权利平等、实施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制、按民族比例划分议会名额等要求。该届大会具有浓厚的泛突厥主义色彩，而且还努力拉近与土耳其的关系。例如，在语言问题上，大会决定使用以土耳其语君士坦丁堡方言为基础的全俄突厥鞑靼人通用标准语，反对在学校中对突厥鞑靼族儿童强制学习俄语，努力在俄国鞑靼族学校中使用土耳其教学大纲等。<sup>7</sup>

在这些大会的激励下，突厥穆斯林运动走向高潮，不仅在圣彼得堡、第比利斯、奥伦堡、托木斯克、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等地发行突厥语报纸，而且还出现了“Tanchi”社会革命党、社会民族党等突厥鞑靼人的政治组织，以及“Shakirdlik”（意指“宗教学校学生的生活”）、“Shakird”（意指“宗教学校学生”）等穆斯林青年组织。在1907年2月第二次国家杜马选举中，有35名

<sup>1</sup> Мухетдинов Д. В., Хабутдинов А. Ислам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 - начале XXI в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 традиции.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НГУ им. Н.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011. С.282.

<sup>2</sup> Аршаруни А., Габидуллин Х.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С.25.

<sup>3</sup> Хасаншин Г.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понятий «панисламизм» и «пантюркизм»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мер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тар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лиянию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крае 1910 г.)// Из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2015. №.5. С.249-270.

<sup>4</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68.

<sup>5</sup> Ильхам Валиев. Госдума и татары.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Татарская деловая газета «Татар». 01.12.2011.

<sup>6</sup> Матвеев 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мусульма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й аспект). С.25-35.

<sup>7</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69.

穆斯林代表当选议员。<sup>1</sup>

然而，1905年革命开始后，俄国突厥穆斯林的政治“繁荣”期并未持续很久。随着1905年12月5日日俄战争的结束，和俄国第一次革命在1907年上半年的最终失败，帝俄的国力开始恢复，政府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国内事务上。俄国穆斯林问题是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年）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地方自治的要求，1910年1月，在斯托雷平倡导下召开了穆斯林问题部长委员会特别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反穆斯林行动和措施大纲》。1911年1月15日，斯托雷平又向部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在穆斯林民众当中遏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影响力的措施》的文件。文件中指出了双泛分子活动的主要表现：一是数万名接受了洗礼的异族人（инородцы，帝俄对其境内的非斯拉夫人和非欧洲民族，特别是对东部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轻蔑称呼），在1905年改信伊斯兰教并积极宣传伊斯兰教；二是宗教和文化教育领域集中到接受了鞑靼人学校教育的宗教人士手中；三是异族人的普通教育机构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鞑靼人色彩；四是出现了一系列穆斯林—鞑靼慈善机构、出版机构、定期刊物；五是鞑靼族知识分子和鞑靼人的刊物，公开进行反对国家和俄罗斯人的宣传；六是与土耳其和埃及建立了联系，青年人到国外教育机构留学。面对这些问题，部长委员会从宗教、文化和行政三个方面制定了对应之策：一是加强东正教会在国家文化活动领域内的地位；二是根据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调整学校教育事业；三是调整伊斯兰教的法律地位，并加强国家对其表现的监控。<sup>2</sup>此时，俄国社会上的右派保守力量得到加强，面对发展迅速的全俄突厥穆斯林运动，他们着手进行反击。1907年6月初通过的新版国家杜马选举法，增加了有产阶级代表的名额，减少了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突厥鞑靼人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人数也大大减少。因此，在1907年6月举行的第三次国家杜马选举中，只有10名穆斯林被选为议员，1912年第四次杜马选举后只剩下6名穆斯林议员。<sup>3</sup>与此同时，俄国突厥穆斯林政治生活的自由发展也受到政府的限制，他们的联合被阻断。此外，帝俄政府还通过专门决议，禁止喀山鞑靼族教师到哈萨克草原和突厥斯坦任教。到土耳其、印度、埃及、阿拉伯等国接受了宗教教育的俄国毛拉，被禁止在俄国境内从事本职工作。帝俄政府加强了对突厥鞑靼定期出版物的审查力度，突厥鞑靼人在市政机关里的人数也被缩减。<sup>4</sup>由于受到帝俄政府强大权力的制约，加上俄国穆斯林内部不统一、缺乏政治斗争力量和经验、单纯依靠精英推动而又没有外部力量支持，他们的政治斗争很快就走向了失败。

扎吉德运动的日趋走低，特别是俄国突厥穆斯林政治斗争的失利，使突厥鞑靼族领袖们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实现民族目标，仅依靠俄国突厥穆斯林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外部帮助，他们不可能使自己摆脱俄国的统治，所以必须与境外的同胞联合起来。在1907年国家杜马解散后，俄国的突厥穆斯林精英开始按地区特征分化，随之而来的是俄国穆斯林社会运动逐渐分解为各个民族的运动，<sup>5</sup>泛突厥主义在俄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还有一些穆斯林政治活动家开始离开俄国。在后者看来，奥斯曼帝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帮助俄国突厥穆斯林的外部国家，因此必须加强与奥斯曼政府的联系。<sup>6</sup>这种结论加上帝俄政府的打压，迫使玉素甫·阿克楚拉、阿里·胡赛因扎德、阿雅兹·伊斯哈吉等多位著名的领袖移居君士坦丁堡。逐渐分化并失去了主要领导力量的俄国突

<sup>1</sup> Ильхам Валиев. Госдума и татары.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sup>2</sup> Хасаншин Г.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понятий «панисламизм» и «пантюркизм»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мер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тар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лиянию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крае 1910 г.). С. 249-270.

<sup>3</sup> Ильхам Валиев. Госдума и татары.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sup>4</sup> Ayas Ishaky. Idel-Ural. P.37.

<sup>5</sup> Хасаншин Г.Р.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ановниками понятий «панисламизм» и «пантюркизм»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соб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мер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атарс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му влиянию в приволжском крае 1910 г.). С. 249-270.

<sup>6</sup> Хостлер Ч. Тюркизм и Советы. Тюрки мира и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XII-XX вв. : т. 9). С.171.

厥穆斯林运动，也走向了终结。

## 五、几点思考

俄罗斯学术界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研究和争论，仍然在进行，并且把对该问题的研究与一系列历史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试图找到俄罗斯现今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的源头。不可否认，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不仅与俄罗斯及其穆斯林社会密切相关，而且还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操突厥语诸民族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前文的粗略研究，笔者认为：

首先，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这场突厥穆斯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回击。泛斯拉夫理论的主要代表、政论家 Н.Я.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他认为，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是各种文化类型的依次更替。斯拉夫类型是历史过程的体现者，具有充分发展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历史政治的天赋，是最高文化历史类型；而其他民族不过是人种原料，他们的文化历史类型只能得到局部发展。依据这种理论，斯拉夫是优秀民族，当然负有“解放”和统治其他民族的使命。<sup>1</sup>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对非斯拉夫人进行文化同化，为捍卫自己的文化生存空间，俄国穆斯林精英借助了所谓的突厥身份。

其次，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两大主要载体——扎吉德运动和全俄穆斯林大会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二者未能形成有效的统一，甚至出现了分歧较大的观点，例如在学校教学大纲的选择上。不可否认，这种脱节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后来迅速失去内生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不仅内部存在分歧，而且还缺乏广泛而牢固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俄国穆斯林知识精英在忠于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原则基础上，支持含有宪政和社会公正思想的宗教—文化革新，但他们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家”，只能算是“半革命家”或“改良派”。而且他们内部在政治取向上还存在“亲俄派”和“亲奥（土）派”的不同，在教育取向上则存在“新教学法”和“旧教学法”的分歧。另一方面，“双泛”宣传活动并未在广大突厥穆斯林民众当中取得明显成功，他们更愿意留在统一的俄国，而不是分离出去。同时，在突厥穆斯林居住地区（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生活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生活的中亚地区，克里米亚鞑靼人、北高加索的多个山地民族和阿塞拜疆人生活的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还存在一系列阻碍俄国穆斯林社会统一的因素：如在自然气候条件、社会发展水平、民众受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地区精英的利益诉求、对俄国发展前景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帝俄政府并没有否定广大穆斯林民众对俄国的忠诚，即使是在制定《反穆斯林行动和措施大纲》时，仍提出了一系列前提条件，如政府措施不应限制宗教自由、排除伊斯兰信众的特质等<sup>2</sup>。

第四，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领导主体是鞑靼族知识精英，活动范围集中在俄国本土，而且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分裂主义要求，直到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移居奥斯曼土耳其后，特别是 1916 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和 1917 年二月革命后，俄国部分穆斯林才有了明显的分离诉求。但此时的主导力量要么位于俄国境外，要么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都离开了俄国的中心区域。1916 年中亚民族大起义，使俄国穆斯林民族运动的分化更加明显。伊斯兰激进派领导者开始鼓动伊斯兰教的卫士，把穆斯林地区从俄国分离出去，他们还与俄国在一战中的敌人土耳其和德国建立了直接联系，而参加起义的多数普通民众则不支持这种分裂主义行为，他们保持着对帝俄政府的忠

<sup>1</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117—118 页。

<sup>2</sup> Борисова И.Д. Макеев Д.А.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чала XX в.// Вестник 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14. №.2(31). С.17-21.

诚。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国穆斯林精英又提出了从自治到完全独立的“自治权”，以及建立本民族独立武装的要求，如北高加索穆斯林山民就组建了一个师。但广大穆斯林民众仍对俄国心存留念，如鞑靼穆斯林民众就曾“真诚地表示他们不喜欢独立，不相信独立，认为在帝俄政府的统治下生活得要比独立时好得多”。<sup>1</sup>

第五，迦斯普林斯基作为“泛突厥主义之父”和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主要领袖，使这场运动含有泛突厥主义的内容是必然的，但泛突厥主义绝不是它的全部内容。更应该说泛突厥主义是俄国突厥穆斯林觉醒的重要产物，并伴随着突厥穆斯林运动的发展而发展，但却并没有因为后者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究其根源，是泛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土耳其重获新生，并在其推动下一次又一次地影响到俄国和苏联。

最后，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繁荣期，与泛突厥主义走向政治化的时期有所重合，但“此政治”非“彼政治”。从前文来看，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斗争以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为主；而根据玉素甫·阿克楚拉于1904年发表《政治的三种形式》一文，比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更有发展前景的泛突厥主义的政治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基于民族因素的政治突厥民族”。<sup>2</sup>当然，也可以说，俄国突厥穆斯林运动的政治斗争是泛突厥主义政治化的一种表现。但是，两种“政治”似乎还是存在着现实与虚幻、低级与高级或者短期与长远的差异，只是俄国突厥穆斯林政治斗争的式微和奥斯曼土耳其成为泛突厥主义的主阵地，使这些难以清晰地展现出来。泛突厥主义后来在奥斯曼土耳其实现了更深层的政治化，并一度成为大国对俄罗斯（苏联）、中亚和我国新疆进行分裂的工具，它对世界历史和地区局势产生的影响至今犹在。

## 【论 文】

### 德国少数民族：两种认同的互动平衡<sup>3</sup>

黄柯劼<sup>4</sup>

#### 导言

本文基于历史进程，对在德国获得官方认定的四个少数民族的基本状况加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德国当代少数民族政策做一分析。本文指出，欧洲语境下的少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本就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对于德国这类非传统移民国家来说，由于国家认同更多地由战后宪法决定，因此国内少数民族的两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不大，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较少产生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增强自身民族认同，维护自己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境内少数民族有时需要借助政治手段、基于国家外交局势，在统一的公民身份基础上维护自身独特的身份认同。通过对于德国的分析，我们将能更好地在欧洲本土框架下理解“民族主义运动”运动的诸多特征。

<sup>1</sup> Борисова И.Д., Макеев Д.А.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чала XX в. С.17-21.

<sup>2</sup> Искандер Гилязов. Тюрк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основных этапов). Казань: Каза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С. 24.

<sup>3</sup> 本文发表于《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

<sup>4</sup>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后、德国洪堡大学社会学博士

欧洲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故乡。根据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西方传统中“民族”（Nation）的要素包含历史性形成的地域、具备政治合法性的社群，通过政治合法性确立的成员平等权利，以及共有的公民文化和价值观[1]。“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在于，民族成员对于自身共同身份、归属感的诉求，推动着他们努力争取与之相应的政治权益。德国地处西欧中心位置，其境内少数民族同样具备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要素；高度的中央集权在历史上出现较晚及二战历史原因，又造成战后少数民族独立意识较弱。本文意在基于历史进程简要地介绍德国四个少数民族的基本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德国当代少数民族政策做一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对于德国这类非传统移民国家来说，如何应对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境内少数民族如何在统一的公民身份基础上维护自身独特的身份认同？通过对于德国的分析，我们将能更好地在欧洲本土框架下理解“民族主义运动”运动的诸多特征。

## 一、概述

要理解德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先要区分德语中几个不同的概念 *Volksgruppe*, *Minderheit* 和 *nationale Minderheit*。*Volksgruppe* 偏向日常用语，语义完全中性，泛指“少数族群”。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固定生活于某一地区，有相近的血缘，也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因此有属于自己的群体认同。*Minderheit* 相当于英文的 *Minority*，在欧洲语境下偏重法律意涵，所指范围最广，指一切因某种文化特征区分于主流社会、并因此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歧视和压迫的群体。*Minderheit* 在德国包括但不限于外来移民、国内少数民族，也包括“流亡者”（*Aussiedler*），他们是一批拥有德意志血缘，但在战争期间流亡国外、战后回到德国生活并重新获得德国国籍的群体。政府主要基于社会公平的考虑处理相关问题。最后一类人 *Nationale Minderheit* 是本文要介绍的重点，其在官方语境中的语义与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一提法中的“少数民族”基本等同[2]。

欧洲“少数民族”问题是伴随着 17-18 世纪在“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欧洲悠久的历史、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造成了族群的丰富多样：据统计，今日每七个欧洲人里就有一个属于少数族群（*Volkersgruppe*）[3]。在 17-18 世纪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发展与传播），新兴资产阶级努力在原有封建帝国的体系内推动“民族国家”的产生[4]。相应地，帝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族群原有的“族群认同”和新出现的“民族-国家认同”之间产生了矛盾冲击。于是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维护其身份认同，努力实现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权益。

如上文所述，伴随着封建政体成为民族国家，少数族群也成为“少数民族”；在民族主义观念和少数群体自决权观念浮出水面时，少数民族问题就出现了。历史上的德国作为一个统一较晚、中央集权较弱的帝国，其境内虽然一直存在着大量拥有自己独特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族群（*Volksgruppe*），区域性民族主义的势头却一直较弱。今日的德国作为民族-国家，其国民的同质性也是非常强的：官方认定的四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只达到国民总数的 0.3%[5]。相比之下，外国人数量却达到总人口数的 11%，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数量达到总人口数的 21%[6]。这四个“少数民族”的认定，以对其独特语言和文化的保护为前提，主要基于 1992 年由欧洲议会签署通过的《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及 1995 年通过的《保护少数民族框架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的规定：《宪章》限定了各缔约国国内的“少数语言”类别，并要求将其作为欧洲的共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条约》指出了需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保护的各个方面，其中中小学的语言课程是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个条约中并未给出“少数民族”的统一规定，而是允许参与国自行定义。德国内政部在前两个文件的基础上，于 1998 年正

式认定了德国境内的四个“少数民族”：丹麦人、弗里西人、辛提罗姆人和索布人，他们各自分别对应着《宪章》中规定保护的几种少数语言。德国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官方话语对“族群”“种族”等话题十分谨慎，对其公民，一贯强调其公民法权；对其身份带来的差异，强调后天自主选择和文化的作用，淡化政治性。

下文将首先分别介绍这四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特征，然后结合德国政体的特点来分析其少数群体政策的来源。

## 二、少数民族及政策

### 1、丹麦人（Dänen）

德国的丹麦人主要集中在德国北部与丹麦王国接壤的联邦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以下简称石-荷州），总人数为五到六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8%-10% [7]。他们是基于历史上丹麦王国和普鲁士王国在战争中形成的边界迁移而形成的。这一过程也同样导致丹麦境内的少数群体——德意志人的形成。

在德国的“少数民族”中，丹麦人属于民族意识最强的一群。早在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之时，石-荷州的丹麦民族独立运动就掀起风潮 [8]。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受到凡尔赛条约约束，必须保证这一地区丹麦民族的自决权。因此，1920年在这一地区举办全民公决划定了两国的边境。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宪法中将丹麦民族作为“讲另一种语言的少数群体”加以规定，并承认他们的权益 [9]。1933年纳粹党上台以后，与丹麦关系相对稳定。即使在二战中，丹麦被德国占领，作为少数民族的丹麦人也免遭严重迫害。二战结束之后的1955年，在此前一系列条约的基础上，当时的西德政府与丹麦政府签署了“基尔-哥本哈根声明”，构成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要基石。在这一条约中，两国分别承认两国各自领土内来源于对方国家的少数民族，力求保障其对等待遇、并承诺维护他们的基本人权、支持他们保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遭到歧视。这一条约同样换来了丹麦对于德国加入北约的支持 [10]。1958年，主要由这一地区丹麦人推动的政党“南石勒苏益格竞选联盟”（Südschleswigscher Wählerverband，简称SSW）通过不懈努力，也同样得益于其海外母国丹麦在国际层面上施加的压力，获得了“特权”：与其他政党必须获得5%以上的选票才能进入州议会不同，SSW无论获得多少选票，都可以常驻州议会。在此基础上，SSW于1965年在西德首都波恩的联邦议会内部建立起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该族群在国家层面的利益协调工作。在德国少数民族争取政治权益的过程中，丹麦人扮演了关键角色。1986年，西德政府的少数民族委员会正式成立，包含了当时西德的三个少数民族：丹麦人、弗里西人和辛提-罗姆人。东西德统一后，生活在东德的索布人也加入了这一委员会 [11]。

在德国，丹麦人身份的认定采用“自愿识别”原则，即，生活在德丹边境地区的公民有权自行决定自己是否属于这一“少数民族”。这一写入各自州宪法的规定对其他三个“少数民族”也同样适用，体现了德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思路：“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完全是主观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与血统无关，而是通过接受教育、与族群社区联系不断增长，通过持续感受、共享记忆和共同命运，来获得强化 [12]。

### 2、弗里西人（Friesen）

欧洲境内的弗里西人起源于莱茵河入海口地区和埃姆斯河流域，混合了部分日耳曼人的血统 [13]。今日的弗里西地区指的主要是莱茵河入海口沿岸的德国、丹麦和荷兰地区，也包括北海上的一系列岛屿。最晚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就存在着他们活动的踪迹 [14]。随着族群壮大，他们最后分裂为东南西北四个部分，语言文字是他们唯一的纽带。时至今日，德国境内说弗里西语的

人口在一万到六万之间，占当地人口的 2%到 12%及德国总人口的 0.06% [15]。根据 1980 年的调查数据，这一地区居民生活中不同语言的混杂性很强：日常语言中，除所在国语言之外，55%为弗里西语，35%为荷兰语，9%为当地方言 [16]。二战期间，弗里西文化的独特性遭到纳粹党迫害，因此战后同样掀起了“弗里西运动” [17]。但与丹麦人不同的是，因为缺乏强大的母国，德国弗里西人的民族意识较弱，他们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积极要求提高自身地位、获取政治权益。由于弗里西语文献少、规模小，在一面倒的德语学校系统挤压之下，该地区的语言多样性日渐萎缩，族群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与同一地区丹麦人的合作（例如在议会参加前文所提到的 SSW 党的党团），帮助他们获得了官方认定的合法地位 [18]，被写入所在的石-荷州的宪法，也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自己文化的影响力，例如在中小学进一步推动设立更多弗里西语课程。总体而言，近年来，弗里西人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19]。

### 3、索布人 (Sorben)

索布人是斯拉夫人的后裔，目前人口约有六万人 [20]。他们生活的地区位于东部萨克森州的上劳希茨 (Oberlausitz) 和勃兰登堡州的下劳希茨 (Niederlausitz) 地区 [21]。约 1400 年以前，他们向西迁徙并定居。这块地区后来被法兰克人占领，并最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土地 [22]，索布人也与作为后来者的“德国人”开始了长期的磨合。18 世纪以后，伴随着启蒙运动和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索布人的自我意识也同步提升，索布学研究被推动，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得到高度重视 [23]。无论是在普鲁士王国还是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索布人与所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对抗始终存在：官方一直试图抹去索布语言和文化的特异性，代之以压倒性的德语，而索布人始终为提高自身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地位而不懈斗争。这种斗争伴随着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而达到高潮。1871 年以后，由于威廉二世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与俄国关系紧张，索布人更被视作帝国境内的一种威胁。这种矛盾也以工业化进程中索布农民起义的形式爆发出来。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冲突下，1912 年索布人成立了自己的代表机构“家乡”（索布语为 Domowina），总部位于萨克森州的包岑市，它是当地多个索布人协会的上层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索布人曾有机会独立建国，但最后还是留在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中，并获得了更多民主权利，得以保存自己的文化 [24]。然而好景不长，纳粹党上台后，对索布人，连同境内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逐步实行了严格的同化政策。从压制索布语、禁止索布旗帜、报纸和各种组织，到关闭“家乡”，乃至驱逐索布人，甚至将其送入集中营 [2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索布人重获自由，在邻近的斯拉夫国家（波兰、捷克）的支持下，重新建立大量的机构来保存、传播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征。然而，由于该地区属东德管辖，执政党统一社会党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缩写为 SED) 致力于依照计划发展经济、推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持忽略态度 [26]；也由于索布人在东德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属于弱势，许多索布人放弃让孩子学习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再加上战后大批难民回流和煤矿工人移入，从 1949 年到 1990 年期间，这一地区东德索布人被同化程度大大提高。在两德统一后，“家乡”重新制定了民主原则，少数民族的权益得到进一步申张。1992 年通过的《宪章》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勃兰登堡州和萨克森州的宪法中都确认了对他们语言的保护。时至今日，索布人通过努力发展双语能力，积极融入工业化社会。

### 4、辛提和罗姆人 (Sinti und Roma)

罗姆人是一个历史悠久、散布于全世界的人种。十八世纪时的语言学研究证明，罗姆人最初的来源在当今印度的西北部。公元二世纪 [27]，他们开始向西迁徙，到了 15 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欧洲国家。德国境内关于罗姆人最早的书面记录是 1407 年。这份记录中显示，这群人由匈牙利西进而来；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群肤色暗沉、头发乌黑的人群来自埃及，便称他们为“埃及人”，这个称呼逐渐变成了“吉普赛人”。数百年来，迁徙动荡的生活使他们发展出一



套独特的求生技能：歌舞表演、贩卖马匹和杂货。虽然以基督教作为主要信仰，但由于其女性成员多从事占卜业、施“通灵”之术，又游离于宗教正统之外，甚至被诬陷为“告密者”[28]。在许多人眼里，他们就是小偷小摸的代名词。在德语区各邦国（如普鲁士、奥地利）和大大小小的封地上，他们被侮辱性地称为“茨冈人”（Zigäner），遭受各种政策的打压。在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内部，歧视性的“茨冈人政策”区别于“外国人政策”，被当作帝国内政的一部分看待[29]。一直到一次大战结束后的魏玛共和国期间，这群人都被看作危险分子而特殊对待。到了纳粹党上台期间，他们也与犹太人一样遭到迫害：在通过各种生理科学手段加以识别的基础上，他们被送进集中营强制劳动并残忍屠杀[30]。二战结束之后，与犹太人群体一样，罗姆人也努力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积极争取权益。1982年在海德堡成立的“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辛提人是对德国境内罗姆人的称呼）下辖17个罗姆人协会，并推动其于1998年正式获得官方认定成为四个“少数民族”之一。

今日的辛提和罗姆人尽管在德国土地上生活了超过七百年，早已被看做德国人的一部分，但却一直在主流社会面前维护自己的独特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刻意保持与主流教育制度的距离，不学习书写[31]，并保留着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模式[32]。今天生活在德国境内的这一少数民族，除了原本的罗姆人后裔之外，也包括来自前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各国的罗姆人难民和移民，因此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来源。他们与其他三个少数民族相比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地域性的少数民族，也不是语言性的少数民族（没有独属于自己的语言）[33]。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后，加之缺乏内部团结和外部支持，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依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上文介绍的“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促进融合、反对种族歧视。2012年，在该委员会的不懈努力下，在首都柏林市中心距离国会大厦仅一步之遥的地点，树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全欧洲遭纳粹迫害的辛提和罗姆人。据统计，今日生活在德国境内的这一族群规模在七万到十五万人之间[34]。只有石-荷州的宪法确认了对这一少数民族的保护。罗姆语（Romanes）作为一种古老语言，早已分裂成为多种不同的方言。由于群体的污名化，愿意规范地学习并掌握这种语言的罗姆人十分稀少。只有匈牙利、奥地利的几所大学设有专门的罗姆语研究机构。

## 5、少数民族政策及相关机构

在德国联邦政府层面，“流亡者和少数民族委员会”（Beauftragter für Aussiedlerfragen und nationale Minderheiten）隶属于内政部，代表的是这两类属于德国公民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区别于主流社会的少数群体。同时，州政府内部也设立了相关的少数民族委员会（Minderheitenbeauftragten）。德国宪法中没有关于保护少数民族的条款，但在上述四个少数民族生活的州，州宪法都通过了保护该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支持“自愿识别”的条款。这一条款规定，个体对于少数民族的归属是完全自愿的，并且不得与作为德国国家公民的一般义务相分离。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不是基于国家权力机构的认定，而是通过自身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经历和选择来主观完成的。所在州的宪法和各类法律法规对少数民族语言 and 文化的“保护”体现在如下方面：法律确保少数民族有权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加入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内容，以及少数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与历史进行的研究有权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关规定暗含着如下事实：少数民族学习和了解自身语言文化传统，必须建立在掌握德语、建立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否则就是违背宪法精神。当少数民族因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后而遭到不公平待遇，其代表机构和各级政府同样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消除敌对，促进族群间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只能基于宪法对普遍公民权的保护，而不是基于“少数民族身份”。

在官方系统之外，一个名为“少数民族理事会”（Minderheitenrat）的框架机构统一代表大量少数民族协会，借此维护少数民族权益。这个理事会并非上层管理单位，而是属于非政府组织。

它没有行政权力，只在柏林设立了自己的秘书处，直接通过联络各地的各个少数民族协会开展工作。在德国，这些自发成立、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协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少数民族政党，正是真正为争取少数民族权益、保存少数民族特色付出努力的团体。以“南石勒苏益格协会”（丹麦语名词 Sydslesvigske Forening，简称 SSF）为例：该协会成立于 1920 年，拥有一万五千名成员和 80 个分支协会，主要目的是维护与生活在与丹麦接壤的南石勒苏益格地区的丹麦人和弗里西人的独特文化。这个协会在“少数民族理事会”的代表之一于 2016 年当选该理事会主席[35]。

### 三、四个少数民族的本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现代国家境内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恰恰是伴随着统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欧洲有着深远的传统。对欧洲各国政府而言，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实现他们在保存自身特色方面的要求的同时，能够同时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要理解德国境内少数民族如何平衡“德意志身份认同”和“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与法国“先有政治共同体，然后才有民族文化意识”的路径不同，德国在 19 世纪以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更优先强调同一政治共同体内成员共有的语言、文化、历史和血统的起源[36]。这一现状随着二战和东西德分裂的历史而改变。战后德国的主流政治家们努力塑造一种基于宪法的、理性的民主政治文化，并以之作为“德意志国家认同”的基础。这一宪法精神努力消解原有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强调基于法权意义的平等公民权[37]。对于战争的反省和战后宪法的维护，以及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制度的信任，构成了德国公民强有力的核心共识。这一事实造成了，尽管历史上同样存在民族独立运动，当代的德意志“国家认同”对于德国国内四个拥有自身独特祖先、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的成员来说是相对开放而包容的。

其次，在上述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独特历史语境下，四个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内涵。对丹麦人和索布人来说，由于能够得到享有同一文化来源的海外母国的大量支持，其民族认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德国与其海外母国的外交关系是实现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保证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表面看来属于民族文化建设的问题实际上牵动着两国的国家利益，其本质是政治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成员本身扮演了桥梁性的角色；国家认同和少数民族认同二者平衡相容，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国家。例如，因丹麦在外交层面上的努力斡旋，德国境内的丹麦族在语言教育、文化保护方面获得了大量权利。丹麦境内的德意志族也享受对等权利，两国在边境地区因此实现了长期稳定。这种稳定的平衡甚至被冠以“欧洲模式”之名[38]。同样地，在两德分治年代，在前南斯拉夫中断与西德的外交关系、进而承认东德的过程中，索布人的努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通过弗里西人的例子我们看到，如果少数民族主要凭借文化手段来建构自身身份认同，必然结果就是这一认同逐渐弱化，直至最后消失。如果没有与丹麦族结成政治同盟，这一少数民族被同化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对辛提和罗姆人来说，民族认同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由于长期处在社会结构的底层并且难以向上流动，他们成为德国社会“永远的外人”[39]，并长期遭受污名化。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族群的成员遭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排斥，难以建立对自己族群的归属感，也很难通过统一的国家认同将自己与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

综上所述，根据两方面身份认同的强度，可将四个少数民族划归到如下图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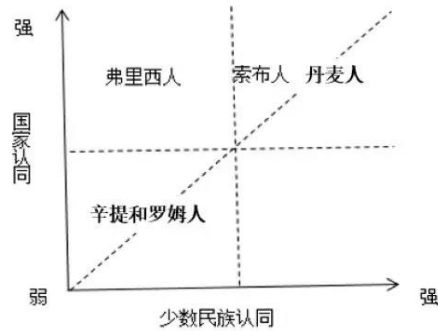


图 1：少数民族自身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关系

在这个图中，丹麦人的两种认同处于平衡发展的“双高”状态。丹麦人、索布人和弗里西人的国家认同水平都比较高，但由于建设少数民族认同的投入程度不同，相应的认同水平也不同。弗里西人语言规模小，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投入少，所以认同水平低。辛提和罗姆人由于遭受群体污名化，仍然处在反歧视、争取公民平等权利的阶段，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较差，甚至不愿融入社会，可以判定其国家认同比起其他少数民族更低，对自身少数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也更低。

#### 四、结语

人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不同的身份属性会获得不同程度的优先性，从而被激活或遗忘，各种属性之间还可能产生矛盾冲突。德国作为非传统移民国家，其基于战后宪法确定的“国家认同”对移民和外来人口的开放程度较低，但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了兼容自身民族认同的空间。这造成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矛盾冲突较小，但相互间仍有作用。少数民族身份在德国不经由官方认定，少数民族获得的扶植措施主要基于政府层面和欧盟层面对其独特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对少数民族而言，维持自身特征、避免被完全同化、捍卫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同时避免因为自身的特殊性遭受其他社会群体的贬低和排斥，是其不愿放弃的权利。然而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政府和欧盟在文化层面上的扶持是远远不够的，还取决于该民族社群的团结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和投入的资源数量，而争取资源的手段常常是政治性的，甚至需要外国同族裔群体的协助。

如前文所述，欧洲语境下的少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本就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对德国的四个少数民族而言，由于国家认同更多地由战后宪法决定，因此两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不大，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较少产生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增强自身民族认同，维护自己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少数政治资源不足的少数民族，必然会面临自身特征逐渐消亡、最终被同化的结局。

参考书目：

- [1]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p. 11.
- [2] Franziska Maria Michalk, *Die Sorben--ein slawisches Volk in Deutschland Ein historische und Minderheitenschutzrechtliche Betrachtung*, Verlag Ernst Völg, 2002, p. 33.
- [3] Jürgen Kühl &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Verlag für Regionalgeschichte, 2005, p. 291.

- [4]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 [5] Franziska M Michalk, Die Sorben--ein slawisches Volk in Deutschland Ein historische und Minderheitenschutzrechtliche Betrachtung, p. 62.
- [6] 数据来自德国联邦统计局的2015年德国人口数据，载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ellschaftStaat/Bevoelkerung/MigrationIntegration/AuslaendischeBevolkerung/AuslaendischeBevolkerung.html>
- [7] Jürgen Kühl &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p. 32.
- [8] Jürgen Kühl &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p. 560.
- [9] Jürgen Kühl &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p. 561.
- [10] 因此学界也将这一区域性的声明称为“波恩-哥本哈根”声明，因为这一声明表面上看是维护地区少数民族的权益，实际上则是两个国家国家利益的交换。
- [11] Jürgen Kühl &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p.572.
- [12] Jürgen Kühl &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p.416.
- [13] Antonia Feitsma, Wybe Jappe Alberts, Bo Sjölin, Nachbarn Die friesen und ihre Sprache. Presse- u. Kulturabt. d. Kgl. Niederländ. Botschaft., 1987. p. 5.
- [14] Antonia Feitsma, Wybe Jappe Alberts, Bo Sjölin, Nachbarn Die friesen und ihre Sprache, p.6.
- [15] Jürgen Kühl &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p.34.
- [16] Antonia Feitsma, Wybe Jappe Alberts, Bo Sjölin, Nachbarn Die friesen und ihre Sprache, p. 29.
- [17] Antonia Feitsma, Wybe Jappe Alberts, Bo Sjölin, Nachbarn Die friesen und ihre Sprache, p. 29.
- [18] Jürgen Kühl &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Verlag für Regionalgeschichte, 2005, p.562.
- [19] Jürgen Kühl &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p.247.
- [20] Peter Kunze, Kurze Geschichte der Sorben: ein kulturhistorischer Überblick, Domowina Verlag, 2008, p.63.
- [21] Peter Kunze, Kurze Geschichte der Sorben: ein kulturhistorischer Überblick, p. 7.
- [22]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C.H.Beck, 1996, p. 13.
- [23]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p. 19.
- [24]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p. 25.
- [25] Peter Kunze, Kurze Geschichte der Sorben: ein kulturhistorischer Überblick, p. 62.
- [26] Franziska Maria Michalk, Die Sorben--ein slawisches Volk in Deutschland Ein historische und Minderheitenschutzrechtliche Betrachtung, p. 26.
- [27]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p. 13.
- [28]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p. 13.
- [29]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p. 47.
- [30]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p. 100.

- [31]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p. 49.
- [32]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p. 64.
- [33] Katrin Reemtsma, Sinti und Roma Geschichte Kultur Gegenwart, p. 177.
- [34] 数据来源: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网页, 载  
<http://www.bpb.de/internationales/europa/sinti-und-roma-in-europa/179536/ein-unkanntes-volk-daten-fakten-und-zahlen?p=all>
- [35] 信息来自“少数民族理事会”对该协会进行介绍的网页, 载  
<http://www.minderheitensekretariat.de/minderheitenrat/sydslesvigsk-forening-ssf-und-suedschleswigscher-waehlverband-ssw/>
- [36] 王柯: 《“民族”, 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 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 总第七十七期。
- [37] 黄柯劭: 《德国的抱负和局限: 以难民潮为例》, 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1期。
- [38] Jürgen Kühl and Robert Bohn (eds.), Ein europäisches Modell?: Nationale Minderheiten im deutsch-dänischen Grenzland 1945-2005, p. 56, 92.
- [39] 这个说法来自德国媒体“时代在线”一篇文章, 德文题目为 Die ewigen Außenseiter, 译为“永远的外人”, 载  
<http://www.zeit.de/zeit-geschichte/2015/04/sinti-und-roma-zigeuner-migration-gewalt-fremdenhas/komplettansicht>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公众号, 欢迎加入并转发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62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 供大家参考, 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